

主 管

中共中央党校

主 办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全国党校文献情报学会

总编辑 / 社长 陈高桐

常务副总编辑 周 慧

副总编辑 张 莹

副社长 武志国

编辑部主任 史小平

本期责编 史小平

封面设计 关小雷

设计制作 崔金杰

责任校对 苏彰秦

封面题字 权希军

编辑出版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05451

传真 (010) 62808900

E-mail dzgbwz@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 0301 号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价 6.00 元

协办单位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要论

- 3 习近平：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

- 4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 逢先知
6 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8 领导人逝世评价折射党的发展历程 / 芦焱 林歆
10 让我们重温 各时期入党誓词

高层言论

- 11 汪 洋：人生观决定幸福观
11 张庆黎：深入群众比说任何大话都管用

学习与研究

- 12 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战略意义
/ 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14 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 / 俞可平
16 提高妇联组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 5 项措施
/ 牛丽华
17 关注各国社会管理创新趋势 / 杨雪冬

农业·农村·农民

- 18 农村：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 贺雪峰
20 转变中的“三农”问题 / 党国英

经济纵横

- 21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 李伟
23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条件 / 顾钰民

反腐倡廉

- 25 腐败高官落马的“寻租”规律 / 黄苇町
26 必须高度重视“集体腐败”的治理 / 许云昭

观察与思考

- 28 从“六普”主要人口数据看中国 / 王桂新
29 人口老龄化变量：若干年后谁还买房 / 荆宝洁
30 流动人口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 陆学艺
31 目前人口结构下的两个差别 / 宋振峰

热点聚焦

- 32 食品安全：各个环节谁在管
33 涉及食品安全职责缺失的症结何在？
/ 李慧 冯蕾

国际政治与经济

- 35 金砖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机遇与挑战 / 李向阳
37 北极权益争端中的中国姿态 / 周良
39 新兴国家的社会难题 / 江时学

民生看点

- 40 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动力呈多元化格局
41 过度医疗几时休？
42 让百姓敢花钱需过三道坎
/ 罗宇凡 赵瑞希 邱明

- 43 分配不公的根源在哪 / 张蕴岭

他山之石

- 44 美公务员廉政的“严管”与“自律” / 赵大卉
45 丹麦人的幸福启示 / 比特纳
47 “意大利行业调研公司(SOSE)”对中小企业的
管理和扶持经验 / 中央党校“意大利体制”学习班

最新书摘

- 48 中国：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
/ 张维为

科技视野

- 49 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 王贻芳
51 我国科技创新贡献率只及德美一半 / 张维
52 最该知道的10大科学定律及理论

海峡两岸

- 53 台海谍战 / 钱亚平

健康之友

- 55 把心脏的潜力挖出来 / 贾海忠

数据库

- 56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56 世行报告显示：我国高速公路通行费全球最高
56 我国制假经济规模逾千亿元

封三 论点摘编

撷英咀华

封二 我们拥有太阳——献给党的九十周年
/ 严阵

封底 征订广告

如有破损、漏页、模糊、影响阅读的，请与本刊编辑部申继红联系调换

特别提醒：本刊登载的署有作者姓名的文章或文摘均有报酬，请作者与本刊编辑部联系或直接与北京市版权局稿酬收转中心联系。

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街11区甲24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 84251823

习近平：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围绕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是学习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阅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就是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过程，会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他们崇高风范和人格力量的熏陶，从而实现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华。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领导干部都集中较长一段时间进行脱产学习是有困难的，主要是靠自己挤时间学习，因此要突出重点，精选精学。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已经出版发行，这两部文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领导干部可以精读其中的代表性篇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的重要前提。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判断形势，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坚定理想信念，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流、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想方法搞正确，增强工作中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才能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深刻，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必须专心致志地读、原原本本地读，努力掌握贯穿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与学习《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形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政策导向、舆论导向、用人导向和体制机制，进一步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

（摘自2011年5月16日《学习时报》）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逢先知

中国共产党90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巨大财富，把它们总结起来会给党以巨大的推动力。对于党的丰富经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列出若干条，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有以下三条，其中每一条都关系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

理论是一面旗帜。掌握了正确的理论，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成熟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并在革命胜利后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不是什么别的理论、什么别的主义如民主社会主义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这一思想原则并付诸实践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不断向前的思想力量。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同时成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其中不少至今还没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主观条件来说，主要就是没有形成符合本国实际情况、有着明确奋斗目标、能够凝聚全党力量的正确理论指导。这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走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关节点。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经过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提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实现了令世人惊奇的大发展大繁荣，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背弃马克思主义，采取错误的理论为指导，结果纷纷失去执政地位，有的连国家都解体了。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

正确的理论来之不易。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集中全党的智慧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正确理论的形成来说，正面的经验是重要的，反面的经验同样是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科学理论，虽然它的某些具体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过时，但它的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会过时的。在我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有多样性，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如果用其他的什么思想、学说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那就是历史的倒退。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离开人民的支持，就一事无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民之中，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命运，建立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我们决不当忘记，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党的支持，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的事业。90年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做得好，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前进；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办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访问中国后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同毛的会谈》中这样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他说得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哲学。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集中体现在党的政策上。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党的政策好不好，对不对，要看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落实到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者有一个教育群众的责任，即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正确的舆论去引导、影响、启发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境界。这是关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大问题，具有长远的意义，切不可等闲视之。在我们的工作中，自以为是，对群众采取命令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反对；对群众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甚至迎合群众中低俗的、愚昧落后的东西也是错误的，也必须反对。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忘了，脱离群众的现象增多了，甚至出现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这虽是局部的现象，但决不能有丝毫忽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国家和民族赋予的伟大历史任务，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首先要把自身建设好，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党的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等多个方面。这里着重就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谈一些看法。

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古田会议开了先河，延安整风是一次重大实践。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对党的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着，在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著作高潮，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形势的

发展，我们党又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回顾从古田会议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80多年间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问题。

党的正确思想总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同时也不放松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批评。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长期忽视党内的思想教育，听任各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组织，最终垮台，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党在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有组织上、制度上的保证，这个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哪个时期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就前进得比较顺利，遇到了困难也比较容易克服，党内生活就生动活泼；哪个时期违反甚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就很不正常，不能形成真正的全党一致，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发生倒退。不能因为党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犯过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过损失，就否定民主集中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恰恰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又一个重要问题。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个制度就一直延续下来了。这是我们党所特有的一个组织优势。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关键环节，党的政策都要通过基层组织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一个基层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就是团结和凝聚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广大群众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是满意的。但是，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凸显，而且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多变、并不太平的国际环境。客观形势向我们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就成为党的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

（摘自2011年5月4日《人民日报》）

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党的历史活动的主要轨迹和脉络。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懈奋斗，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结合中国近现代史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的重要历史使命。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的。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必须完成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紧密相连，前一任务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条件。为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为出发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而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是近代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和桥梁，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建国初期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1952年年底，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

就决定了我国既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年的历史，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历史。

高度重视偏离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的问题

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就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党的历史，看待党所走过的路。近年来，一些人打着“反思历史”的幌子，诋毁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等。对于这些偏离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近代以来，中国多次尝试过改革途径，但事实证明这种道路根本走不通。只有进行革命，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前提。中国近代以来的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尽管都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伟大的民族复兴扫除了制度障碍。因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告别革命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片面夸大党的历史错误的倾向。有些人不顾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片面夸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错误，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完全否定新中国前29年的成就。他们的根本要害是通过否定党的历史来否定党的领导。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艰辛的探索历程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甚至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主要的，是主流。不能因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失误和挫折，就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所经历过的失误和挫折，并善于从中总结和汲取教训，不断增长本领。“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才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才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才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对人民、对民族负责的党，是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把权力斗争作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观点。有些人把党的历史描绘成党的领导人之间为争夺权力而残酷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有党内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的领导干部都是经过长期认真选拔的，权力斗争不是也不应该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将经验教训转化为不断开拓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党的历史不仅同党的过去相联系，还同党的现在和将来相联系。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围绕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的经验教训，就要将其转化为不断开拓的智慧和力量，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必须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担当起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党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因此，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而且是现实的需要。

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反复说明，什么时候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国家就会富强，人民就会富裕；什么时候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国家发展就会延缓，人民生活就会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她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富国强、振兴中华。

必须大力扩大人民民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结束了长期以来受压迫和欺凌的历史，第一次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的，我国又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加上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的时间还不长，人民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实现形式还不够完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受到各种因素限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要走很长的路。我们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切实保障人民能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必须大力推进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全体人民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共享发展成果。党在探索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曾经搞过绝对平均主义，结果导致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问题也十分突出，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成为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充分就业，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摘自《前线》2011年第4期）

领导人逝世评价折射党的发展历程

芦 焱 林 歌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获得“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的领导人均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又有5种不同表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执政党对逝世的政治人物作出的评价，不仅是普通的人物评定，也是执政党的一项重要政治考虑。中共中央1980年起草、影响至今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毛泽东作出评价。

那么，领导人逝世后究竟都有何评价？这其中又有何深意？

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逝世后的评价高度至今无人超越。今天，对毛泽东最常用的评价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其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评价最具分量。这一评价在共产党人内心的分量之重，从毛泽东的话语中便可看出。

在由埃德加·斯诺执笔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获得“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的领导人均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又有5种不同表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是中共90年历

史上的9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9人中，前5人在中共发展或新中国的建设上长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党内的地位广受认可。

李大钊是中共建立初期与陈独秀享有同等威望的领导人，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董必武亦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并且是参与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之一。他的革命生涯比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还要早：1911年，他在辛亥革命时便战斗在革命一线。1972年2月下旬，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建议由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

任弼时在上世纪40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中亦贡献巨大。他长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瞿秋白则较为特殊，对其评价在历史上反复变化。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称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日报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10周年时发表文章亦沿用了这一评价。

除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外，陈云独自享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他独享的另一称号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亦可见他在当代中国历史和党内的特殊地位。

此外，叶剑英、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徐向前等人都被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富春和曾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中央总

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为总书记）的张闻天被称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87年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无其他修饰词语。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相比“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至高的政治荣誉，领导人逝世后获得的称号中，还有更为“写实”的一部分，即根据所从事领域工作确定的称谓。这些评定中，最为常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三种。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三种称谓前又有“伟大的”、“杰出的”等修饰语。

这其中，能够称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领导人并不多。这一名单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杨尚昆、王震。

兼具三个评价的还有彭德怀，具体表述为“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其他常见的组合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前者的代表有徐向前，这位功勋卓越的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负军事与国防重任。享有这一称号的还有贺龙、陈毅、罗荣桓、罗瑞卿等人。

后者的代表有刘少奇和陈云。

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还有邓颖超和胡耀邦。

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2008年逝世后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样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未被称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还有李立三、宋任穷、薄一波等。

随着时间变化的评价

有两类领导人去世后的官方称谓改变较大：一种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另一种则是“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并在后来获得平反的领导人。

前者最为典型的是陈独秀。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

明确使用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提法，并取代了此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使用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

这一提法直到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才正式变更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用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新提法。

另一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王明，虽然经过多年研究评价有所改变，并开始强调其在抗日问题上的贡献，但是至今官方评定仍然以两次错误路线为主。

与陈独秀命运相似的还有瞿秋白。

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瞿秋白在1927年11月—1948年4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1950年，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赞扬他“英雄的立场”，“不愿屈服”的精神。5年后，瞿秋白迁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又被定为叛徒，墓地被红卫兵破坏。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为其恢复名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的一批领导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重新评价。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陶铸等。

事实上，一些领导虽未经历从被打倒到平反的过程，其官方评价亦发生了明显改变。

如在1976年初逝世的周恩来，当时官方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既无“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也不见“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与多数人的评价轨迹相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风光无限的康生，因迫害大量干部，虽在1975年逝世时获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但这些称

号在1980年均被撤销，并被开除党籍，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后主持大量平反工作的胡耀邦，因其在平反工作中表现出的果断、公正和胆识，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威望。

淡化了革命年代的气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领导人逝世后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讣告发布中有一个区别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评价：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共产主义战士”这一评价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成为中央领导人逝世后的常用语。享有这一评价的既包括老一辈领导人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也包括荣毅仁、谢非等后来步入高级领导岗位的干部。

2011年逝世的刘华清，是最近一位逝世的兼具“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称号的领导人，同时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与前代领导人相比，“共产主义战士”的评价与“马克思主义者”皆属政治荣誉，“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则更似“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属“职业评定”。而相比以前，这些评价显然淡化了革命年代的气息。

与老一辈领导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等称号不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的政治荣誉现今并非主要领导人才能享有。2009年逝世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获得了同样的称号。

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进入政治局并权倾一时的王洪文、张春桥，逝世后均未获任何正面的政治评价。

与他们相比，林彪因其曾经的功绩而处境不同：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林彪位列其中。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9期）

让我们重温

各时期入党誓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各时期入党誓词都庄严凝炼。

红军时代

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时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要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的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原载2011年4月27日《光明日报》）

汪洋：

人生观决定幸福观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专题读书会上说，人生观决定幸福观。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会有正确的幸福观。一个只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是不会把群众的快乐作为自己幸福的源泉和动力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从方法论来谋求如何让自己幸福，而首先要从人生观上解决什么是人生幸福的问题，然后才能在研究幸福的方法上有更多的收获。

汪洋说，幸福是分层级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观都会有不同的幸福观。要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幸福文化，以开放的眼光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完善我们的幸福文化，尤其要注意用新的眼光来评判传统幸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事实上，鼓励探索进取、努力拼搏和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比如，广东，既是一个锐意创新、勇于探索的地方，也是一个平和兼容、知足常乐的地方。从某种角度讲，知足才不焦虑，才有快乐；安心才不浮躁，才有幸福。

汪洋说，让人民生活幸福是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如《幸福的方法》一书所指出的美国经济水平提高与美国人幸福感觉的不一致性一样，实践证明，并不是有了物质财富人们就幸福了。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们的幸福为代价来谈发展；要注意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感受，不能以发展速度为理由，让影响群众幸福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就很难做到发展的过程使人快乐、发展的结果让人幸福，不能在追求幸福的问题上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摘自2011年5月9日《南方日报》）

张庆黎：

深入群众比说

任何大话都管用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吉隆县调研创先争优、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时说，自治区党委今年在全区开展创先争优、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区地县三级选派12500名党员、干部进驻1514个村，与当地农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村子都是自然条件艰苦、经济发展滞后、社会问题集中的地方，其中有的村子区地县干部来的少，甚至从没见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比说任何大话都管用，工作组到这里来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每一位工作组的同志，都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善始善终地把这项活动搞好，确保“进得去、站得住、受欢迎、见实效”。

工作组要把工作往深里做、实里做。要尽量扩大面、实现全覆盖，争取挨家挨户走到，要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谈心，不留空白。注意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意见，真正把一手材料拿到手。号准群众思想的脉搏，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惠民富民政策能入脑、入心，解开群众思想上的扣子，让群众知道惠在何处、惠从何来。

要边了解情况、边解决问题。让群众见到党的干部、听到党的声音、感受到党的温暖，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村里的困难有多种，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思想上的，也有经济上的。通过帮助村里和群众理清发展思路，让群众找到发家致富的路子。要把问题梳梳辫子、排排队，本着由远及近，先易后难的原则，能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协调相关部门解决，近期解决不了的，要向群众讲清楚，给个说法。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反分裂和维护稳定是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事情。要巩固团结和谐，妥善处理矛盾，让群众过上安稳日子。要注意帮助村党支部、村委会健全制度、提高水平。“人无头不立，鸟无头不飞”，选好人、用好人十分重要。

（摘自2011年5月4日《人民网》）

完善社会管理体系的战略意义

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大意义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开始改革开放到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提并论形成“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格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我们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社会管理科学化，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需求的集中反映。从国内形势看，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社会管理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且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凸显，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就表明，只有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才能把握难得的机遇，迎接严峻的挑战，巩固和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既是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和谐

与稳定的长远需要，也是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既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长远需要，也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既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长远需要，也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内涵的深刻阐释

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鲜明特色之一。

社会管理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要通过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正确把握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核心内涵主要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要坚持人民主体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社会管理中，我们要高度尊重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广泛发动群众，精心组织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二是要坚持人民公仆观。广大党员干部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共产党人除了人民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在社会管理中，我们要在感情上始终贴近群众，在工作中真诚服务群众，在生活上切实关心群众，始终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永远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

终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是要坚持社会和谐观。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出来的。在社会管理中，我们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观正确引导群众、教育群众、激励群众，最大程度地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适应群众基本成分复杂化的新趋势把工作做细致，适应群众社会结构复杂化的新趋势把工作做扎实，适应群众利益诉求多样化的新趋势把工作做全面，适应群众思想观念多元化的新趋势把工作做深入，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

坚持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

扎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价值理念上，要始终坚持和谐稳定与群众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维护群众利益必须维护和谐稳定。如果社会总是处在激烈的冲突状态，总是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何举措都将难以实施，维护群众利益只能成为空谈。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信息网络管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特别是通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水平，增强社会诚信，切实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另一方面，维护和谐稳定必须维护群众利益。不和谐、不稳定的突出表现就是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没有公民社会权力的实现和民生的保障与改善，不可能有充满生机活力的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所

以，一定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体系等，特别是通过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形成科学有效的权益保障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等，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行为范式上，要始终坚持党委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必须坚持党委的领导地位，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党委、政府代表着人民群众，不坚持党委的领导，不强化政府的主导责任，我们的社会管理就有可能走偏方向，失去整合的力量。另一方面，必须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参加社会管理。这是社会管理中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在外部联系上，要始终坚持社会管理与改革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绝不是社会建设的全部内容，而且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的其他内容如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我们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同时，要全面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总体格局中，社会管理也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都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执笔：刘小敏 左晓斯）

（摘自2011年5月9日《光明日报》）

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

俞可平

未来 30 年的改革重心将转向社会政治领域

如果说过去 30 年我国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那么未来 30 年改革的重心将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任务将变得更加突出，受到更多的重视。为什么这样？因为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和最紧迫的问题，例如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正、依然严重的腐败特权、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单靠经济的增长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无法解决的。例如，今年年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一些调查数据表明，从总体上说，去年我国的经济表现相当出色，我们成功地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依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民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按理来说，经济增长了，民生改善了，人民群众应当对政府的服务更加满意了，幸福感更强烈了。但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这最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仅靠经济发展远不足以让人民有幸福的生活，让国家能长治久安。

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普通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例如，居民的安全感缺失了。我们小时候上学，几乎没有家长接送的，现在哪个小学，甚至中学，一放学校门口没有等待接孩子的家长？吃饭担心米有镉，吃菜担心有农药残留，喝奶担心有三聚氰胺，住进新房担心有装修污染，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遇到的挑战既广泛又严峻，这些挑战包括：社会公正、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社会诚信、利益协调、社会保障、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社会救助、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社区治理，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等等。

改革和完善社会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了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传统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开始解体，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传统的单位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户籍制度开始变动，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所有这些，都导致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日益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我认为社会管理的重点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特别是权益保护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公共安全机制、社会稳定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应急管理机制、基层治理机制、社会自治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创新。至于说到难点和关键，在我看来，在于如何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静态稳定（以堵为主）与动态稳定（以疏为主）等等。当然，从理论上说，它们都应当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矛盾的。但我们切莫天真，以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了。事实上，重要的是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怎么办？

强调社会管理不能忽视社会自治

社会管理是政府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管理。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公共权力部门，它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重要职能。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体是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是一种非政府行为，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一体之两翼。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片面强调社会管理忽视社会自治，会造成公共权

力过度扩张, 损害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反之, 片面强调社会自治忽视社会管理, 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失控, 影响社会稳定。因而, 我们既要加强社会管理, 但也必须推进社会自治。

我们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真正在社会领域实现善治, 既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管理, 更需要高度的社会自治。随着民主法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文明的推进, 社会自治的功能应当得到更大的发挥。因此, 近年来, 特别是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以来, 中央既强调要加强社会管理, 维护社会稳定, 又强调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扩大基层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在强调社会管理时, 十分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社会自治的作用。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 也与我国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 社会事务不仅日益增多, 而且越来越繁杂, 政府决不可能事无巨细什么都管。那样, 不仅是不堪重负, 而且也无能为力, 得不偿失, 尤其是不符合人类社会民主治理的根本方向。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 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因此, 党和政府必须转变角色和职能。要更多地从传统的一些管理领域中超脱出来, 扩大公民自治的领域; 要转变管理的方式, 努力从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 维护社会稳定, 要从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

公众意识提高推动社会进步

在政治发展的现阶段, 社会治理的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但是, 从长远看, 如果还政于民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 那么, 公民的作用必将变得日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民的意识和素质决定着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 对于社会自治来说就更是这样, 因为社会自治的主体就是公民自己。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公民意识和素质方面, 最重要的进步是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

大大觉醒,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多数老一代人还在用传统的民本政治价值来评价现实政治进步时, 多数年轻人已经用自己的民主政治价值来衡量政治发展了。例如, 老一代人如遭受冤狱, 通常会在昭雪时对党和政府千恩万谢, 但年轻人发生类似的情况, 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向政府索赔。对于公民身上存在的问题, 大体说来, 对于改革开放前成长的那代公民来说, 主要还是权利和法治意识要继续增强; 而对于改革开放后成长的年轻公民来说, 主要是责任和义务意识要相应提高。

我认为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 日本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些启示: 第一, 社会的良好秩序应当更多依靠社会的自治和自律。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政治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第二, 现代化决不只是 GDP 的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国民素质的提高, 是制度的完善和成熟。第三,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 是社会善治的基础, 国家发生危机时, 这种合作尤其重要。第四, 国家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 紧急事件一旦发生, 这套机制就能自动运行。“临时抱佛脚”必定事倍功半。第五, 人类需要重新审视核安全战略。

· 名词解释 ·

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协调运转, 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控制的过程。一般认为, 社会管理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社会管理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 狭义的社会管理指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摘自 2011 年 4 月 18 日《文汇报》)

提高妇联组织社会管理

科学化水平的5项措施

牛丽华

1. 建立了解和掌握妇女需求及利益表达机制。为了充分行使妇联组织代表妇女群众参与利益协调的职责，必须珍惜并积极拓展妇女利益诉求的反映渠道。一是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就公共政策的完善，经常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二是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民主协商；三是建立专报制度。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经过严格筛选之后提出对策，向党政领导及时反映妇女与人民群众的呼声。

2. 建立健全妇女情绪疏导和矛盾化解机制。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组织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城市下岗失业妇女和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现实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出嫁女权益保护、征地拆迁补偿纠纷增多，我们要从关注妇女民生问题入手，建立矛盾化解机制和利益调处机制。首先妇联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对与妇女维权及发展有关的问题，妇联自身能解决的，要抓紧落实。自己解决不了的，要紧紧依托党政资源，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吸纳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推动妇女事业发展。

3. 建立健全事关妇女儿童突发事件应急干预机制。遇到突发事件，应积极配合政府，实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响应机制、新闻发布机制、中外记者采访服务管理机制、舆情研判机制，及时干预处理机制和善后工作机制，及时稳妥的处理突发事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4. 建立绩效管理和评估机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向公众并服务公众，必然有其严格的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妇联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理当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建立健全妇女工作评估体系，实现从定性

到定量、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这一体系建立的过程，实质是对妇联自身工作定位、思路重新梳理、反思的过程；是确定工作导向、确立妇女工作价值观的过程；也是理清职责、规范工作、实施科学管理的过程。如我们在家庭建设过程中，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标准，细化了家庭建设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从文明家庭创评、家庭文化、家庭教育、家庭养老等10个方面，提出了30多项标准，使家庭建设从口头上的号召落实为家庭成员的具体行动。另外，还要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传媒和社会评价手段，畅通妇女和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评价渠道，逐步建立开放式、社会化、群众化的妇女工作评价体系，这是妇女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

5. 完善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发挥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妇女儿童工作各类协调机构的作用，认真履行妇联作为再就业工作、农民工工作、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职责，加强同社会各界的联系和沟通，积极为妇女参与农村改革发展争取政策、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支持。要进一步发展面向农村妇女儿童的公益慈善事业，做大做强妇联各类实体阵地，不断扩大农村妇女儿童的受益面。要进一步拓展为农村妇女儿童服务的国际合作平台，加大引进项目、吸纳资金的力度，促进农村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妇联组织要积极借力、借势、借平台，推动政府强化主体责任，实行综合大维权服务，凸显了妇联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作者系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巡视员)

关注各国社会管理创新趋势

杨雪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都开始改革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分担政府职能, 承接社会管理任务

为了应对社会管理中的新问题、新挑战,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执政党提出了改革思路和创新举措。概括来说,有以下内容——

1. 不断提出新的价值理念。比如欧洲社会党国际倡导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让全民都参与到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社会管理之中,建立“权责对称的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分享的经济”;英国工党自执政以来,倡导社会创新,卡梅隆政府上台后,提出“大社会”理念;欧盟则一直强调要实现“多层次治理”和“复合治理”。

2. 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每次大选时各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总是社会管理问题,各党派竞相提出有吸引力的社会管理改革纲领,以稳定传统选民,吸引新生代选民。各国政府除了加大社会管理方面的投入,还探索向地方、社会以及企业分权,积极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中央—地方—基层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新体制。

3. 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已成为各国社会管理改革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政府网站成为公开政府信息、简化办事程序、收集民众诉求的平台;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政府部门还利用微博等网络工具,直接与民众交流,了解民情动态。

4. 积极鼓励社会创新。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近年来把推动社会创新、培养社会企业家作为社会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动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分担政府的职能,承接社会管理的任务。

5. 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鼓励社会管理创新的“公共服务奖”。美国、巴西、南非等国的学术机构或社会组织设立了鼓励政府创新的奖励计

划——据统计,在获奖项目中,社会管理领域的占了一半以上,而奖励的导向是鼓励更加关注人们的需求,更加细致扎实地工作。

社会管理改革的核心不是强化管理, 而是改善治理

总结国外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值得借鉴的经验——

首先,社会管理体制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联系紧密,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因此改革必须要从国情出发。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具有相似性,共同问题在不断增多,因此各国在这方面需要相互学习借鉴。

其次,社会管理改革的核心不是强化管理,而是改善治理。各国的经验表明,不仅要减少对市场的管制,还要减少对社会的管制。通过改善治理,既避免政府干预过多、负担过重,也扩大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各个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社会管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公民权利,提高社会的团结和包容。社会管理既要为每个公民提供均等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也要为其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只有公民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才能培养出对社会的热爱,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及对政府的认同。因此,社会管理改革要为消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提供有效的制度渠道、对话平台和物质保障。

第四,社会管理改革迫切需要更有力的科技手段支持。以网络为代表的技术手段,已经展示了其社会管理中的价值。随着人们需求的多样化,交往方式、组织方式的改变,社会管理需要更加精细化、具体化,这就要善于运用科技创新来完善管理和服

(摘自2011年4月27日《文汇报》)

农村：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贺雪峰

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进城务工农民返回农村的道路是畅通的，但同时又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主要是由农民的个体愿望、农民个人的微观努力与宏观结构之间的碰撞造成的。

进城务工的年轻人都充满憧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工作，可以融入城市，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但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很努力、运气又好的人可以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家的机会。大多数进城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开始下降，只能返回家乡。

消费性投资存在浪费现象

务工多年，农民工有了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的积蓄。如何用好这笔积蓄，使自己返乡后能够有所作为，成为即将返乡农民工日思夜想的问题。目前，返乡农民工一般会将进城务工的积蓄用作两方面的投资，一是生产性的，一是消费性的。

最常见的消费性投资是建房，尤其是在北方农村，农民外出务工的首要目标就是建一栋像样的房子。这是因为房子耸立于村庄，别人都是楼房，你一家是平房，面子上难看还是其次，儿子到了说媳妇的年龄没人上门提亲才是关键。在北方农村，结婚娶媳妇的前提是建一栋像样楼房。而且住房是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有了一栋像样的房子，就有了安居的地方，有了稳固的家，有了心理后方，也有了活动场所和避风港。但在建房问题上，目前农民的投资存在很多不理性的地方。由于住房攀比，很多农民房屋换代过快，将辛勤劳动获得的收入用在不必要的房屋更新换代上了。这种现象在华北农村尤为严重。

另外一种消费性的投资是购买家电产品。近年来，国家为拉动内需，推动家电下乡、摩托下乡、手机下乡、汽车下乡。这些下乡，一方面使农民拥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在调查中常常发现，农民购买了各种电器，却从来不使用，因为用不着；年轻人结婚，花5万元

购买全套家电，然后夫妻双方外出打工，10年后夫妻回村生活，而当年购买的家电早已过时。而这10年，夫妻外出务工的净收入可能也就只有5万元。此外，外出务工赚钱所导致农村高消费，还表现在请客送礼、酒席奢华、结婚铺张等各个方面。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大

农民多年务工所积蓄下来的收入铺张浪费，实在可惜。若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可能会较好地发挥作用，但这也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因为返乡农民工的积蓄太少，而投入生产的风险却很高，稍有不慎，所有投入就都打了水漂。

多年在农村调研，笔者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县城和一些中心镇的临街店面几乎年年都会换主装修开业。一个店面要营业，可能要3万元装修，3万元办营业执照和各种证照，1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进些存货销售。这样，投入接近20万元，一家精品店可以开张营业。但在县城，想开店的人很多，购买力却很少，一年下来，店面开不下去了，所以将店面转让出去。新接手的开店人再花3万元装修，3万元办证照，一些钱作流动资金，到一年后又亏本开不下去，再转让、装修。结果，仅仅是装修和办证费用，就使一个外出务工几十年的农民工，在一两年内即将所有积蓄亏得精光。

农民工返乡，往往不愿意一下子回到村庄，而是首先到县城和镇上，等到在县城将所有积蓄亏掉了，再回村庄。回到村里的农民，若有积蓄，也会选择投资。他们办小型加工厂，办养猪场，种经济作物，搞运销，开店办厂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他们的产品大都只是针对当地市场。当农民工返乡比较早，创业机会好时，他们就有较高的创业成功率。而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的返乡，市场很快饱和，创业越来越难，失败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而一旦失败，农民进城务工几十年的积蓄就没有了，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因为他们的

年龄已经很大，基本上没有再外出务工的机会。地方政府和媒体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只会加剧回乡创业农民工在有限市场内的竞争和增加他们创业失败的比例。

从以上返乡农民工的投资情况来看，可以总结出农民工返乡的路径。

第一，返乡农民工在县城或镇上投资办厂，或开设店面，其中少数人会成功，多数人会失败。少数成功者成功地融入到县城或镇上生活，余下的人中，部分人并不甘心失败，继而再创业，再失败，直到最后不得不回到村庄。还有部分人直接回到村庄。

第二，返乡农民工回到村庄创业，如运销、办小型加工厂、建养猪场。同样只有部分人会成功。

第三，返乡农民工回村建房开小店。因为小店开得太多，利润很少，因此无所谓成功；同时，因为开小店并不需要大投入，也就无所谓失败。

第四，返乡农民工将积蓄用于建房，娶媳妇，维持村庄生活和交往。因为有务工的积蓄，所以可以在村庄生活得较为体面、安逸。

第五，返乡农民工购买奢侈品，可以显示出在村庄中较好的社会位置，从而获得好的心理感受与自我评价。

第六，超过自己经济实力的盲目攀比。有时政策和媒体（尤其是电视）在鼓动这种盲目的对农民殊无好处的攀比。

农村是生活而非创业场所

在整个中国已成为买方市场，小规模产业创业几乎无发展空间的情况下，指望农民用自己外出打工积攒的积蓄回乡创业，实在是风险很高的事情。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创业所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创业空间越来越小，而返乡回来的农民工却越来越多，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风险极高，但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因此，在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让农民工安全使用手中的这笔积蓄，十分重要。

更重要的是，农村也许并非创业的地方，而是生活、休养的场所。在这方面可以用笔者所提出的“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模式进一步阐释。

返乡农民工用自己在城市务工所创造的收入来

过好他们返乡后的生活。他们在农村的生活，远较在城市贫民窟生活的质量要高。这样一来，返乡农民工就构成了中国社会中最为稳定的力量之一，这也就是笔者所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稳定的农村而不是创业的农村，构成了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基本前提。在中国未来30年，城市若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可以使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可以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则农民工返乡的越来越少，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中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则那时，可能既无农民工返乡的问题，也再无农民工创业的问题。

而目前的这二三十年，农民工返乡是一定的，返乡农民工能在农村安居下来，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而不是冒着极大风险去创业，不仅对返乡的农民，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2011年4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征 订 启 事

为便于读者和订户连续收藏本刊，我编辑部已将2010年度《党政干部参考》杂志全年12期装订成册，欢迎新老读者和订户订购。另外，我编辑部还有少量2001年，2003年—2009年《党政干部参考》合订本。每年定价60元（含装订费和邮资）。

订购方式：

从银行、邮局汇款，请在留言条中注明《党政干部参考》2001年、2003年—2010年合订本。

开户行：北京建设银行海淀支行

账 号：2613000507

户 名：《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 编：100091

款到即开发票。

转变中的“三农”问题

党国英

过去讲到“三农”问题，通常指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这三个方面。经过国家多年努力，这三方面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改善。尽管这三方面问题仍然存在，但其背后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对此需要有清醒认识。

首先，粮食增产逐渐转变为农业竞争力问题。

目前，我国基本保持主要粮食品种的供需平衡，粮食的绝对生产能力并无问题。粮食最终产出，除气候因素外，主要取决于播种面积和农民的投入意愿，后者又取决于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扩张，城市务工的总收入将日益增长，相比之下，因为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很小，农业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去城市务工而放弃农业的机会成本相对也越来越小，这导致一部分边际土地可能被撂荒。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山区适农小块土地退出耕作，谷物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越来越集中到若干农业主产区。但是，除东北和新疆等地外，我国农业主产区的农户经营规模增大很难，土地流转的比重很小，只在10%左右，这就限制了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粮食生产具有土地集约的性质。若耕地广袤，可减少灌溉，减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仍可获得一定的粮食产量。但我国适合集约耕作的平原地带面临日益严重的耕地减少局面。平原地区耕地减少使我国农业低成本生产条件受到破坏，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保持和提高。

其次，户籍农民收入提高问题正在转化为专业农户收入提高问题。

到现在，我们的统计还是没有很好地区分农民和非农民，以致“农民收入”这个概念很模糊。作为务农劳动者的真正农民，其增收的关键在于农业经营收入提高，而不是户籍“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高。

长远看，大部分工资性收入不能算到农民收入的盘子里，而应成为城市非农居民收入。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看，我国平原、丘陵和山区农业从业者兼职比例呈递减趋势。这意味着收入越高的所谓

农民，越依赖非农工资收入，换句话说，我们常说农民收入增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指脱离农业但仍然保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工资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我们是拿部分非农居民收入的增长夸张地表述为农民收入的增长。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但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日益增大，这种错误表述的负面意义也越大。这不仅仅是表述问题。从我们的调查看，我国农业领域的雇佣工资的日工资单价基本与城市持平，真正务农的农民，其总收入取决于他们总的工作日有多少。

最后，农村稳定越来越转化为城市管理问题。曾经引起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税征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及集体财务不清等。目前，这些因素随着农业税废除、农村城市化和农村集体企业民营化而消除或减弱。征地、拆迁、“城中村”改造等涉及土地的官民冲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但深入地看，涉地冲突主要发生在城市扩张的边缘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大多脱离了农业生产，已不是真正的农民。

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我国的城市化是所谓“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或者可叫做“半城市化”。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当然是城市问题，而不是农村问题。

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提出了一个核心工作目标，叫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表述的本意应该是强调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在体制上的统一性，而不是指城市和乡村人口所获得的公共品在数量上完全相等。有了制度的一体化，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可以有差异，不必要求完全均等。有的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综合水平可以高于城市，有的则可以低于城市；还有的公共服务农村不需要或不必要，城乡公共服务制度一体化的方向是土地市场的一体化、劳动市场的一体化以及公共财政的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所谓“三农”问题，要靠城市扩大的办法来实现，只不过我们不需要农民住在城里，而作为“城外市民”就够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总第512期）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李 伟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 3%—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 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 70%—80%；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 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 2400 亿元，2003 年涨到 5400 亿元，涨幅高达 125%，到 2009 年为 16000 亿元，去年为 27000 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

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 2010 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 27000 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 GDP4000 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

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

◆ 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 2010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 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

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 50% 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 2000 年的规划到 2020 年是 1800 万，但 2009 年就已达到 1972 万，加上流动人口 1000 万，已达 3000 万。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 672 万吨，日均 1.84 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 1.27 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 2020 年，北京至少需要 3200 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 6 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 1000 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 26 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 36 亿立方米。仅 2000—2007 年，地下水超采达 56 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 2005 年和 2009 年举例，两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 40%—

60%；我们 2005 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 31.6%，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 29%；2009 年高档占 26%，最低档占 20%。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其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 GDP 都达到 1 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依据中央文件的提法，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内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存在差异的，但我认为在管理的基础目标上是相通的。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 80 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条件

顾钰民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显示了其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长期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主要问题不在于人们主观上不想转变，而在于转变的条件不充分，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推进。要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关键要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市场条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着内在关联，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根本上是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在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驱动力结构变化上的表现。生产力发展的载体是企业，因而企业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只有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

实于企业，才能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各种要素中，市场机制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创造完善的市场条件是促进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市场机制具有促进企业自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竞争机制来实现的。因此，重要的是要创造能够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条件。市场机制在为企业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力的提高。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观念的转变还是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良好的市场条件。客观的市场条件迫使企业必须有这样的观念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竞争条件越充分，企业这一观念也就越强烈。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转到创造更好的市场条件、塑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和增强企业自身转变发展方式的能力上，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企业

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效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

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信危机。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如对鳏寡孤独的救助问题在我国明朝时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则以监守自盗论处。对于特殊群体，我们必须关注。与其用财政资金去做那些有GDP、无效率的投资，还不如用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

（摘自2011年4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的自觉行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条件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为实现经济增长拉动力的转变提供体制保证。具体而言，需要完善以下几方面的体制：

完善对消费品生产，特别是对服务业发展的投资体制。必须在投资体制上保证政府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项目的投资力度和比重，放宽对社会资金投向服务业的限制，使提高消费比重、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都能够得到体制上保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到实处。

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体制上保证国民收入再分配更多地向直接形成居民收入的方面倾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和数量，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再分配途径获得更多的收入。

完善初次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必须从体制上扭转压低劳动报酬作为降低生产成本最主要途径的这种观念和做法，使企业逐步提高报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既能够保证企业创造的总收入中有更多的份额成为劳动者的收入，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质上是实现经济发展源的转变，即经济发展主要靠要素驱动向主要靠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源的不同，反映的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强弱。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要在体制上保证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创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条件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任务，政府作为政策的制订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主要通过制订政策来实现，而政策是政府功能最主要的体现。

政府政策能够影响所有的生产主体，所以，政府的作用远大于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经济发展政策不仅从宏观上主导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从微观上规范着企业的行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政府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要求出发提出的战略任务，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它能够按照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总要求，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或对哪些方面给予支持或对哪些方面进行限制，并能够进行灵活的调整。政策具有的这种独特优势和作用，决定了研究和制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体系，为整个社会实现这一转变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是政府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行为制订鼓励性政策。政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在于：一是发挥明确的导向作用。政策引导人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该如何去做以及重点做些什么事情。二是发挥利益激励作用。政策之所以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包含着利益激励因素，政策规范了如何按照政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去做，就能够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对不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行为制订限制性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说，限制性政策的效果比鼓励性政策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一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不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行为和现象，而不是等出现了这些行为和现象以后再着手解决。

市场、体制、政策这三大方面涉及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需要对此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形成共识，更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为实现这一转变创造更好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不能满足于理论宣传和对其重要性的论证，而应该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对如何创造市场、体制、政策这三大条件的研究，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能够通过依靠市场作用、体制功能、政策激励来实现。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腐败高官落马的“寻租”规律

黄苇町

省部级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条条”与“块块”领导机关及重要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举足轻重作用。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每年都有一些省部级高官在廉洁问题上出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党的高度警觉。

被“牵”出的腐败高官

多数落马的高官起初还是勤政廉政的，是靠干事创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有的还有着辉煌过去。但他们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不能正确看待个人的功绩和作用，当进一步升迁受阻、个人愿望不能满足时，就认为是组织亏欠了自己、随着心理失衡扩大，便从掌权为公蜕变为以权谋私。有人称这种腐败堕落为“起步晚、发展快”，在很短时间内便完成了从“人”到“鬼”的转变。还有的干部自身素质本来就不高甚至政治品质不好，只是由于熟谙“官场潜规则”，善于在“人事”上下功夫，而逐步达到谋取高位的目的。

腐败高官被揭露、发现和查处的几率相对较小，不仅因为经多年经营，其从政根基更深厚、关系网更发达，干扰办案的能量更大，而且还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一是他们处于地方和部门权力金字塔的顶层，行使权力环节多，不像一些基层腐败活动，直接侵害具体群众的利益，易引起反弹。二是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约监督，使得高官个人的以权谋私活动能够更多地披上组织决定的外衣，决策透明度也往往随决策层次升高而降低，局外人监督更如“雾里看花”，当前杀伤力很大的网络曝光和舆论监督的可能性也较少。三是高官腐败以受贿为主，中低层官员中常见的贪污和挪用公款行为比较鲜见，行贿方更以使用账外现金的私人老板为主，无论公私账面上都很难发现犯罪痕迹。四是腐败高官心术缜密，见多识广，作案手法谨慎。有人通过调查统计，发现真正具有向高官行贿资格的人非常之少。腐败高官尽管受贿数额巨大，但除卖官者外，直接受贿

对象都限于很少的人，甚至一两人，双方结成巩固的利益同盟，以减少被发现风险。因此，与中低层腐败案件通过信访举报或审计监督而立案的比例相当高的情况不同，高官腐败案件大都不是在本人行使权力过程中被发现，而是被其他案件“牵”出来的，是被在生死关头急于戴罪立功的下级腐败分子和行贿的老板“咬”出来的。纪检监察机关部门和检察机关对于网住这样的“大鱼”，有时也缺乏思想准备。正是这种风险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导致高级官员腐败屡禁不绝，甚至“前仆后继”。

“财富精英”构筑腐败关系网络

随着转型期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已出现了一批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私人富豪。作为“财富精英”，他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就要努力实现资本和权力的结合。高价收买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已成为最主要的经营手段。这在国企改革、房地产开发、重点工程建设等领域尤为突出。当前省部级干部的主体，都是“文化大革命”末期或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私人富豪们的财富积累及消费方式，也对他们产生很大诱惑。有的通过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有的指使、纵容亲属子女利用自己的权力背景经商；有的则效仿低素质富豪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包养情妇，搞权色交易。

腐败高官的眼中只有个人利害得失。因此，他们推进改革还是阻滞改革完全取决于既得利益。他们不愿退回计划经济时代，是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能占有资源却无法“变现”；他们也不喜欢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后者不允许权力过多地介入资源分配。他们希望能够维持一个行政权力能够长期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可以寻租的市场。靠行政权力占有经济资源，靠市场把占有的资源“变现”。

有数据说明，在高官腐败案件中，与“行政审批权”有关的案件要占到60%以上。批项目、批地、批上市公司，都为某些腐败高官带来滚滚财源。大量事实说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越深越细，

必须高度重视“集体腐败”的治理

许云昭

“集体腐败”的表现

说到“集体腐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些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违规谋取集体福利的行为。比如，违规发放奖金、补贴、实物、购物卡；违规为干部职工建房或者以高价购买商品房再低价出售给个人；为干部职工超标准交纳各种公积金、保险金；免费或低价向干部职工提供乘车、用电、用水、通讯等服务；以学习考察之名轮流组织干部职工公费旅游；超编制超标准配置公务用车、公车私用；擅自为管理人员确定高额年薪，等等。这类行为大多属于违规违纪，但在部门和单位内部却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得到干部职工的支持，大多经过集体决策，而且分配比较平均，决策者通常并不比其他干部职工得到更大份额，有的单位的领导班子还可能是迫于“关心干部职工”的压力而作出这方面决策。但我们不能低估这类以“福利”名义进行的集体谋利行为的危害性。因为这类行为不仅直接扰乱收入分配秩序，造成部门、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严重损害社会公平，而且往往与执法和管理中的利益驱动、“三乱”、截留收入、转移和套取资金、“小金库”等违规违纪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以后者为前提。同时，在为大家谋福利的名义和幌子下，可能诱发、隐藏

少数人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说，这类不规范的福利行为以及相关的违规违纪行为，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治理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取得的成效，又要看到问题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上对此仍然诟病很多。

除这些打着福利旗号的大集体谋私行为外，还有一些性质更为恶劣的“集体腐败”问题需要引起我们加倍警觉。一是集体贪污。二是集体索贿受贿。三是集体行贿。这种行为的主要决策者和参与者虽然不直接得利，但严重破坏了政策的严肃性，损害了党和政府威信，应该作为“集体腐败”的一种特殊形态来看待。

“集体腐败”的成因

正常情况下，“集体腐败”作为一种需要多人共同配合完成的腐败类型，其实施的难度和败露的风险都比个体腐败要大。“集体腐败”在一些领域和部位的易发多发，除那些导致腐败滋生的一般性原因外，还需要某些特定的土壤和“催化剂”。

部门、行业、单位收入差距过大，使“集体腐败”具备某种“群众基础”。长期以来，由于工资外收入不规范、不透明，不同部门、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一直比较大。部门、行业、单位在福利上

“权力寻租”空间可能就越大。因此，要改变行政权力过多控制资源分配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状况，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

制度如何不空转

遏制高官腐败现象，也要综合治理，但关键是要抓好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制度防腐的核心之一，是要坚持“党要管党”，实现对高级领导干部管理监督制度化，不能使其变成脱离组织的特殊党员。

高级领导干部的世界观相对定型，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廉政教育，包括把宗旨意识教育和从政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其接受监督、管理的自觉性，

并和刚性监督措施结合起来。例如，为避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出现制度空转，对个人报告材料与群众反映不一致的，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应进行初步核查。条件具备时，要变向组织申报为向社会公开。

实行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使公众有充分的监督机会。报告和公布个人事项，在有条件时应扩大到独立生活的直系亲属。这既是对党和群众负责，也是对高级领导干部本人的政治生命负责。

（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4月（下））

的互相攀比使集体谋利在一些部门、单位内部有了某种“群众基础”。一些单位的领导或屈从、或迎合、或利用这种心理，想方设法开辟“财源”，甚至不惜违法乱纪，为自己、班子、本单位部分或全体人员谋“福利”，逐步走上“集体腐败”的道路。

权力结构相对固化，为“集体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合适土壤。“集体腐败”侵害的标的一般是比较大的目标，或者流量较大能够产生规模效应的目标。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目标处于多人的管控之下或需要由多人共同经办。这样，要实施“集体腐败”，就需要拥有不同职权的多人互相配合或者需要多人多次的反复操作。这些都要以参与者之间的高度合作与信任为前提。只有在一种相对固化的权力结构和稳定的环境中，这种在搞腐败上的高度合作和信任才有可能达成。

权力运行不透明，为“集体腐败”提供了生存空间。受主观与客观、技术与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目前我国一些部门和单位权力运行仍然处于不透明状态。一些行使重要审批权力、执收执罚权力、资金项目管理权力的部门和单位对外部不透明；在部门和单位内部，掌握重要项目和资金审批或其他重要职能的机构对内也不透明。

财经制度纪律松弛，为“集体腐败”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逐渐发展起了比较完备的财经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部分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特别是当这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打着弥补单位经费不足、解决干部职工生活困难等旗号时，部门和单位内部普遍不会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违纪资金不是直接向群众摊派，而是截留、挪用项目经费等公共资金的话，社会的关注更少。

监督处罚不及时、不到位纵容“集体腐败”。由于“集体腐败”常常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很多情况下处于主观故意与客观过失、合理需求与违规手段、个人违纪与集体违规交织的边缘状态，案件定性和责任区分比较难，处理起来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对违纪事实处理多，对违纪人员追究少，从而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

“集体腐败”的防治

防治“集体腐败”，必须根据“集体腐败”的特点以及发生原因和规律，多管齐下，综合施治。

规范社会分配，逐步消除产生“集体腐败”的

社会基础。在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进行全面清理的同时，结合即将开始的工资制度改革，按照“同城同酬”、“同地同酬”的原则，严格规范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资福利，通过“削峰填谷”，缩小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保持在一个适当水平，消除滥发福利的冲动。

加强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的监督管理。要针对“集体腐败”易发高发部位和环节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是单位和单位之间、单位内部各机构之间要建立适当的权力制约制衡机制，消除“权力孤岛现象”。二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将财务公开作为重中之重，积极探索内部公开、外部公示的各种手段和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大额收入和支出、反复发生的收入和支出要随时发生随时公开，对于一些跨层级管理的资金如各种项目资金要实行重点公开。三要高度重视对“一把手”的监管。“集体腐败”问题出在集体，关键在班子，根子在“一把手”。四要高度重视对基层一些“不起眼”单位的监管。基层站、所、队、场等单位机构不大、职能偏弱，是监督工作“神经末梢坏死症”的高发区，如果同时掌握了一定资源，就很可能滋生“集体腐败”。

积极探索外部监督办法，形成完备的监督体系。在继续完善各项监督制度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外部监督上。一要健全任职交流制度。二要严格财务检查和审计制度。三要建立“集体腐败”责任上追一级的制度。四要健全社会监督制度。

健全相关制度，让腐败分子无法“抱团”。腐败集体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防治“集体腐败”，要通过各种方法，防止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促使已有的腐败集体内部的利益平衡发生变化，加速集团的瓦解。

严格执行党纪国法，加大惩治力度。凡发生“集体腐败”的单位，其党组和班子应予以即时改组或解散。对参与腐败的成员，应在分清领导责任、直接责任、协从责任的基础上，严格按团伙犯罪、单位犯罪进行处罚；对没有参与腐败的班子其他成员也要根据情况作出适当处理。同时，要针对目前一些“集体腐败”现象难以定性和界定的现象，加紧完善现有纪律规定和法律法规，确保“集体腐败”各方面问题的处理都有法可依、有纪可循。

（摘自《理论视野》2011年第4期）

从“六普”主要人口数据看中国

王桂新

世界第一规模的人口，是我国最基本、最宝贵的基础资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普查时点我国大陆人口为133972万人，居世界第一位。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决定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源。世界第一规模的人口，是我国最基本、最宝贵的基础资源。正是这一庞大的人口，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满足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消费市场，形成了对外企、外资的强劲吸引力及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为我国经济规模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了基础性保证。

但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不仅受制于人口数量，也取决于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及文化科学素质仍然不高，这也正说明我国目前所具有的国家竞争力及国际影响力，主要是由人口数量决定的。对此视而不见，一味把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看作是负担，是片面、不正确的。

人口迁移流动更趋活跃，人口地域分布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与2000年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从人口的迁移流向和地域分布看，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由此使东部地区人口比2000年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下降1.1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下降0.22个百分点。

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迁移流动比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更加活跃，而且主要由西向东的人口迁移主流，又使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上升，人口的地域分布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人口、

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更趋活跃、且以由西向东人口迁移为主流的人口迁移模式，促进了我国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劳动力资源仍很丰富，但已迎来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与10年前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比重上升并占70%的劳动年龄人口（如果按15—64岁计算劳动年龄人口，该比重则几乎达到75%），显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十分富足，即使考虑近年高等教育发展，扣除高校在校大学生，劳动力资源仍属丰富，足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快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转变速度，这使我国已迎来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快速发展的少子化影响，已由幼儿、中小學生波及到大学生，目前全国高考人数已比前几年明显减少，2009—2010年两年即已累计减少200万人，并呈加速减少趋势；老龄化将弱化社会活力，加大社会抚养负担，特别在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出现“未富先老”，会使社会养老的矛盾突显。不难想象，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会对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衡，可能造成一个时期的男性过剩和婚姻“挤压”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8.06，虽比2005年和2009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性别比略有下降，但仍明显高于正常范围。

不可否认,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化了人们“男孩偏好”的行为选择倾向,造成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不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已超过120甚至更高的水平。其结果导致婚龄适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男性逐渐累积增多,由于缺少适龄女性人口婚配,于是形成男性婚配人口的过剩和婚姻“挤压”。出生性别比失衡和由此造成的婚姻“挤压”,无疑将影响我国家庭的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素质在提高

从受教育情况来看,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

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说明10年来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的成效,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

境外人口特别是外籍人口较少,国际化水平尚待加强

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居住在我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23万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2万人、台湾地区居民17万人,外籍人员59万人,合计102万人。而在这些境外人口中,居住时间五年以上的只有25万人,以定居为目的的不足20万人(18.66万人)。

这说明我国在吸引和接纳外国人方面显得比较保守和封闭。相反,我国的人才、资本则纷纷外流。

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已日趋活跃,席卷全球,而各个国家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也都应该是双向发展的,不仅有人才、资本的输出,也应该吸收和接纳相当外资、外企和外国人的进入。只有这样双向发展的互动,才能真正参与到国际化、全球化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收获国际化、全球化的效益。

(摘自2011年5月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人口老龄化变量:

若干年后谁还买房

荆宝洁

有一种假设:由于老龄化进程加快,未来的一对夫妻通过继承遗产,有8套房子。

这个假设是否可能存在,人们在4月28日似乎能看出一些端倪。

国家统计局在这一天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77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26%,比2000年增加了4000万人,比例增加了2.9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口出生数大降。2010年0—14岁人口为2.22亿,占总人口的16.60%,比2000年减少了6000多万,比例也下降了6.29%。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对于这种变化感到震惊。他指出:“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国家统计局曾经在去年10月份,完成了一项对5个城市住房空置率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从城里到近郊,再到远郊区,越远则住房的空置率越高。国家统计局人士则指出,目前对于全国是否有太多住房空置,以及由于老龄化加重使得住房空置率加大,还需要等到本次人口普查10%的长表数字出来。

而对于这种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不少学者认为,持续下去的话,中国房地产供求严重失衡的卖方市场终将改变,住房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并非没有可能。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表示,“总有一天,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赵晓认为,目前中国50%的城市化率距离发达国家65%以上的城市化率仍有距离,地产业仍旧将在未来10到15年时间里快速发展,但黄金十年将演变为白银十年。未来10年,地产商无法轻易从中获得暴利,不确定和风险都在逐步加大。

(摘自2011年4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流动人口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陆学艺

这次人口普查结果反映出很多问题，其中流动人口的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超过 2.6 亿人，比 2000 年增长 81.03%。而这 2.6 亿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及其家属。

产生所谓的“农民工”，本来是个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却成为一种常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工厂的集中形成了城市，所以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应该是同步的，农民进了工厂，也就自然成为城市居民。中国在 50 年代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时期，也是这样的，一面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一面是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那时，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但是，自从 60 年代初出了三年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短缺经济，严格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当时工业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城市化却停滞了。直到 1978 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 17.9%，82.1% 的人口还是农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状况大有改善。与此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大量出现，这正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好时机。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就大量出现了。按说，这部分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工厂，从企业取得工资收入，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理应是工人了，理应是工厂、企业所在地的居民了。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全世界除中国只有北朝鲜、贝宁等极少数国家实行），他们的户口不能迁，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不能变，他们在城市里，在工厂里干了 5 年、10 年、15 年了，

他们还是农民工。

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五六千万的流动人口是正常的，而现在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 2.6 亿。因此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光是影响社会稳定，更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当前，我们国家各种犯罪案件多发，社会治安不好，跟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流动人口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息息相关。据调查，2.6 亿流动人口中有接近 9000 万人是 80 后 90 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跟 60 后、70 后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管理他们，这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是不相符的。

实际上，所谓的流动人口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把城乡二元结构搬到城市里来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市场，有两种身份，两种人。这些人是没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社会肯定不能安定和谐。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改革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摘掉农民工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帽子。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所有现代化国家，都有一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工人、市民的过程，并没有搞农民工这一套。我国是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农村容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农民要发展，城市也需要用工，但户籍制度等没有改革，不得已，只好当农民工。应该说，农民进城当工人，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但搞成农民工这一套，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后遗症的表现，也是我们改革不及时，不到位的恶果，所以给农民工带来了许多的苦难，给社会给政府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客观地说：这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户籍制度惹的祸，本来可以不是这样的。因此，要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那是永远也解决不好的，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现在已经形成的农民工这套体制和做法。

（摘自 2011 年 5 月 12 日《社会科学报》）

目前人口结构下的两个差别

宋振峰

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渐进而缓慢的，一般要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因此，一定时期内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持久而深刻的。

至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公认的成果，然而也在累积一些新的问题，目前有关讨论相当活跃。我认为，在目前的人口结构下，有两个差别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是，由于继承人数、家庭财富的差异，城乡之间下一代人的贫富差别会拉得更大。

城镇家庭的收入、家庭财产本来就大大高于农村家庭，而独生子女又是唯一继承人。相比之下，农村家庭收入低，多个子女均摊的是相对微薄的家庭财产，这使城乡之间目前本来就很大的贫富差别在下一代将会拉得更大，潜伏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人均收入方面，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人民币，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不及前者的1/3。家庭财产方面，根据北师大教授钟伟比较粗略的估算，现阶段城镇居民拥有约125万亿元财产，农村居民拥有35万亿元。分别平均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头上，城镇居民人均拥有财富量约为23万元，其中确权财富约为人均2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拥有财富约为17.5万元，其中确权财富约为人均5万元。

农村居民的名义财富量主要是土地，但土地等所有权属性及价值不够明确。如果按确权财富即土地之外的动产和不动产计算，城镇居民人均拥有财富约为农村的4倍，这个差别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计算可继承的财产，这个差距更加惊人。按城镇三口之家计算，现阶段其独生子女能够继承的父母的财富约为40万元，农村按两个子女的四口之家计算，现阶段每个子女能够继承的父母的财富仅为5万元，两者相差达8倍之多。如果考虑到实际上农村家庭超生的情况相当多，而城镇家庭超生的情况特别少，这个差距可能会更大。而富裕和少生、贫困和多生往往会产生相互强化的马太效应，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

第二个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城乡第二代乃

至第三代的素质结构差别的拉大。

在现阶段，受教育程度较高，抚养和教育子女能力较强的城镇居民基本上都只生一胎，由此往下，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贫困的家庭多胎情况越普遍。因此，年轻人口最大的基数在农村。相对贫困的多子女家庭，无论在抚养能力还是在教育投入上都力有不逮，导致农村多子女家庭的子女获得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远低于城镇独生子女。以高校学生比例为例，2009年1月《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全国范围内高校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到2008年约为50%，而在收费较高的重点高校，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农村考生多数涌向收费低或不收费的高职高专或提前批次录取院校。

受教育机会的不均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别，造成计划生育政策下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人口素质整体上的被拉低，包括营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拉低，是形成正金字塔型的人口素质结构而不是合理的“枣核型”结构的原因之一。据2008年有关方面的数据，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8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70%以上，外出务工的农民受教育的程度相对高一些，也只有大约8.3年，而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平均为11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国劳动力的净增加绝大部分将来自农村，来自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群体。劳动大军整体素质的低下将使我国的技能型人才严重不足，高级技术人才更为短缺。经济转型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知识大军，而不是低端产业中的农民工队伍。另外，部分素质低下的人群也容易被边缘化。

民族的素质决定未来社会的质量，不合理的生育结构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人口素质结构，其作用将是隐形的和长远的。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受教育程度不同、户籍不同的阶层产生的效果，催生了并在继续强化着这种不合理的人口素质结构。

但目前关于人口政策的议论，多是围绕年龄、性别结构的调整，有意无意地绕开了这个相对敏感的话题。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20期）

食品安全：各个环节谁在管

每当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后，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困惑：这事到底该由谁来管？

本文选取其中主要部门，晒晒他们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职责。

国务院食安办：加强协调、监督、指导

2010年2月6日设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是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承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张勇介绍，食品安全办的主要职责是对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综合协调和监督指导。基本定位是在分段监管的基础上，将分段监管容易出现的监管空白、职责交叉等作为协调重点，堵塞监管漏洞，促进各环节监管措施的衔接。同时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农业部：监管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

农业部主要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主要职能包括：

一、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提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建议。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研究推广、宣传培训。

二、参与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组织制定农业行业标准，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制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

三、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监督抽查，组织对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生产资料进行监督抽查。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预警分析和信息发布。指导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指导实施农产品包装标识和市场准入管理，等等。

四、依法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认证和监督管理。包括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实施认证和质量监督，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

五、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和机构考核。

质检总局：监管生产加工和进出口活动

依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生产加工活动和进出口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

根据《食品安全法》，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商务部门：主管食品流通行业

根据商务部“三定”方案和《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商务部作为流通行业主管部门，在食品安全方面主要有三项职责：

一是制定食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采取措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加强对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促进食品经营行业健康发展。

二是负责对生猪屠宰和酒类流通的行业管理；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推动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证书审核换发工作，依法把好定点屠宰企业市场准入关。

三是配合卫生部，做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划及其实行计划，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适时组织修订。

目前，商务部正稳步推进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试点建设。

工信部：管理食品工业行业

工信部具有食品工业行业管理职责。

涉及食品安全职责缺失的症结何在?

李慧 冯蕃

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今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近期频发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在不断拷问着我们:食品安全事件的症结究竟何在?

在国家行政学院专题研讨班上,有关专家认为,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依法合规使用,有利于丰富食品种类、品相和味道等,并且也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如果企业受利益驱使,为降低成本,不按国家标准规定,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为牟取暴利在食品生产经营和农产品养殖种植、收购运输中使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非食用物质,必然产生严重后果。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孙晓莉指出,现在多个部门都承担了监管职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反思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也应

看到,目前,我国食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建设滞后。食品行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现象比较普遍,许多企业特别是小作坊等安全投入不足、管理能力薄弱,少数从业人员道德缺失、不讲诚信,这些是食品安全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食品安全危机背后是信任危机,信任危机背后实际上是食品的生产模式带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分析说。

生产模式:“小”、“散”问题怎破解?

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水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食品生产消费大国,但食品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和行业诚信道德体

主要职能:一是制定合理科学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食品工业行业标准,指导企业完善内部质量控制和监测网络以及食品质量可追溯体系;二是推进食品工业企业生产者诚信体系建设,以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法律意识,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三是加强行业自律,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指导协会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四是加强食品行业相关基础信息的统计和监测,建立食品工业质量安全、产品进出口动态的监测和预警机制等。

工商部门:监管流通环节

国家工商总局承担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责任,下设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局,负责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拟订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办法;组织实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质量监测及相关市场准入制度;承担流通环节食品安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和重大食品安全案件查处工作。其准入职责包括“先证后照”,即负责颁发食品流通许

可证,再对有许可证的经营主体颁发营业执照。

食药监管局:监管消费环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消费环节食品卫生许可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定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开展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状况调查和监测工作,发布与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有关的信息。

消费环节即餐饮服务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该环节的食品是指即时加工制作,即时消费的食品。同时消费环节还包括提供食品及其场所、设施、服务等。

公安机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生产经营者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人民日报记者富子梅 冯华等根据各相关部委提供的资料整理)

(摘自2011年5月5日《人民日报》)

系完善程度还都较低。食品工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数量巨大。种植养殖环节也是小、散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食品产业组织化、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低，食品产业技术、工艺水平、产业链条和管理水平落后，有关食品质量安全的制度和机制设置也远落后于实际问题出现的速度。”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连辑指出。

仅以生猪养殖为例，美国养猪户数仅有7万，我国则有6700多万；美国养殖规模在500头以上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出栏量占全国的96.6%，我国养殖规模在500头以上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出栏量仅占全国的31.5%；美国4家大型肉类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超过90%，我国排名在前1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不到10%。生产经营者规模偏小、数量庞大、高度分散，给食品生产质量安全管理与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困难。

“小、散、乱不仅仅存在于农业领域。”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秘书长马勇认为，中国食品工业的现状是企业分散、技术薄弱、装备落后。这种现状的直接结果是市场竞争激烈，为了生存，降低直接的生产经营成本，在利益的驱动下，非常容易出现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各种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行为。

规制体系：监管软肋缘何频现？

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人们都在质问，我们的监管体系存在哪些问题，为何不能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前“未雨绸缪”。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指出，目前，我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是行政监管力量不足，其次是职能分散交叉，权责不清，三是行业协会、第三方检验机构等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四是监管工作量大、成本高，很容易出现监管的漏洞和死角。

与此同时，监管依然面临立法和执法的制约，由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现行法律威慑力不够，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使得很多企业为了追逐利益铤而走险。因此他建议，应明确“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工作思路，建立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机制。

在国外，食品安全的政府管理模式主要有单一

部门管理和多部门管理两种，德国、加拿大等国采取单一部门监管模式，美国、日本、法国采用多部门监管模式。实行多部门管理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建立了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强化了责任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因多头管理可能出现的职责不清和监管空白。罗云波认为，坚持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实施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以农业标准化作为食品安全的基础，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管理机制是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给我们的具体启示。

罗云波说，此外，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第三方食品安全检验机构普遍存在，并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第三方食品安全检验机构不完善，检验机构分属不同部门，缺乏服务社会的意识和积极性。

约束乏力：地方保护如何消除？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表面看是一个经济问题，实质上涉及管理、监督、服务、保障各环节的系统工程，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已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它既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关乎市场经济下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王健分析说，目前，政府管理“有形的手”长于“宏观调控”，短于“微观规制”。王健认为，当前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暴露了目前社会诚信生态危机、政府规制机制薄弱和规制软约束等问题。

专题研讨班上，许多地方官员、专家学者都建议，当前还是要切实创新社会管理，真正建立起全社会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建立法律、中介组织、社会力量等多个要素连环运行的管理系统，形成制约合力。

此外，食品安全问题除了多部门管理带来的“九龙治水水不治”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问题根源之一。专家指出，一些大型食品企业是纳税大户，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不能因此而包容或纵容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

恩格斯曾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今天，当我们面对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种种缺失、困境和危机时，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应当从付出的代价中更快地成长、成熟起来。

（摘自2011年5月13日《光明日报》）

金砖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机遇与挑战

李向阳

在中国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引世人瞩目，不仅因为首次接纳南非作为成员，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明确希望加入或成为观察员。尽管金砖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历史渊源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妨碍它们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与扩大。事实上，在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有了更广泛的利益“交集”。这种“交集”突出表现为金砖国家经济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共同机遇和挑战，从而构成深化合作的基础与动力。

一、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双速”增长，金砖国家短期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

众所周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金砖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球经济才免于陷入更深的衰退。此后，又是金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引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然而，率先复苏也使其经济政策的选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国内资产价格过高与通货膨胀压力在2010年已经开始威胁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除了俄罗斯以及新成员南非的通货膨胀率低于2009年水平，巴西、印度和中国的通胀率都明显超过2009年，其中印度的通胀率超过了两位数。另一方面，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实施加息政策，也面临着短期资本流入和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欧元区）继续实施低息政策的情况下，金砖国家通过加息遏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很难取得成效。当然，大幅加息有可能遏制目前的通货膨胀，但很可能以经济的迅速减慢为代价。为此，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成为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在国际金融危机阶段，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入复苏阶段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缓慢，而金砖国家则实现了快速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估算，

2010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增长率为2.7%，而南非、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增长率则分别为2.7%、3.8%、7.6%、9.5%和10.0%。这种差异导致双方之间的经济政策导向分歧加大：前者还在继续实施危机阶段的低利率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后者已经不得不进入加息轨道。展望未来，一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进程确立，进入加息轨道，国际短期资本还存在从金砖国家市场大规模流出的风险，这将给金砖国家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冲击。因此，金砖国家之间如何协调各自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各自国家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导致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制约金砖国家快速发展的空间

“再平衡”被认为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不能再依靠危机前的负债消费模式。“再平衡”将表现为美国减少个人消费，增加个人储蓄。据美国相关研究机构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私人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私人消费将减少大约1000亿美元。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上升了4—5个百分点，美国私人消费本应明显萎缩，但实际结果显示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储蓄率上升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负储蓄（财政赤字增加）抵消了。显然这并非一种常态，依靠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来刺激消费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需求不足将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再平衡”还要求顺差国同时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对此，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将首当其冲。

其他金砖国家对中国经济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俄罗斯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提供者，巴西和南非是中国主要的原料提供者，中印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日益提升。面对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的趋势，金砖国

家需要进一步扩大相互间的贸易、投资往来，充分发掘各自庞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优势，为自身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全球气候变化规则一旦形成并生效，将迫使金砖国家不得不改变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为此制定出全球规则，已逐渐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规则谈判的准则，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明确的两大阵营。

针对气候变化规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金砖国家分歧的本质是经济利益，即成本的分摊与收益的分配。许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支付，发达国家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净受益者。从气候变化谈判的收益来看，发达国家的收益程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多年来支撑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重新充当支柱产业，他们迫切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产业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然而，无论是发展清洁能源还是传统能源的减排，都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只有制定出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规则，发展低碳经济产业在经济上才是可行的，才能够吸引投资者进入。

一旦按照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出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并加以强制性实施，金砖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便如此，金砖国家也不可能拒绝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大趋势。为此，金砖国家一方面需要合作，在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争取达成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另一方面，还需要共同探索有别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

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将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提升创造新的机遇

多年来，金砖国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但是，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却没有出现同步提高。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者，不会轻易地让渡权利。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为金砖国家改变格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向人们昭示了一个事实：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危机的形成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进入后危机时代，改革全球金融体制已成为全球共识，金砖国家对于这一改革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围绕改革的议程，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内开始使用统一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夙愿。美元体系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由一个主权国家来发行世界货币，而世界货币的使用者却没有能力约束发行者的不负责任行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货币。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看，应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的特殊提款权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这就需要改革国际基金会的投票权或份额。迄今为止，通过二十国集团这一平台，金砖国家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份额的提升。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改革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份额提升，都是以减少欧洲小国的份额为代价的。欧美大国的份额，尤其是美国的份额并没有改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美国是唯一具有“否决权”意义份额的国家，欧盟国家的份额加在一起也具有“否决权”意义。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格局，即使特别提款权有朝一日成为未来的世界货币，它和美元仍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欧盟）有权决定它的规则；其构成也主要是少数几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与英镑）。

在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金砖国家也面临类似的境遇。比如，在2010年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对美联储实施第二轮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行为，金砖国家曾经给予严厉的批评，尽管当前发达国家还需要倚重金砖国家，但仍然无法阻止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未来如果发达国家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金砖国家面临的阻力将会更大。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意味着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因此，金砖国家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显然，金砖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符合五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能够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摘自《求是》2011年第8期）

北极权益争端中的中国姿态

周 良

近年来,随着北极冰层逐渐融化,北极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在的地缘战略地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以及巨大的经济和科研价值,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地区,并引发各国对北极资源的争夺。西方媒体甚至预言,对北极的争夺可能将像当年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殖民地一样激烈。

北冰洋沿岸国家有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丹麦和挪威,通常称为北极5国。国土进入北极圈的国家还有瑞典、芬兰和冰岛。这8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北极8国。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对北极的争夺主要在加拿大、美国、丹麦、挪威和俄罗斯北极5国之间展开,争夺的焦点主要围绕海上边界和沿岸大陆架的划分以及北极航道控制权展开。

北极5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向北冰洋方向延伸,这为他们获得北极地区丰富的渔业和矿产资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5国彼此相连,谁都希望在北极地区拥有更广阔的海域,从而拥有更多的海底资源和渔业资源,这导致它们在如何分割相邻海域以及交界区域领土的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中最为激烈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围绕阿拉斯加大陆架问题的争端、加拿大和丹麦之间的汉斯岛争端、美国和丹麦之间的格陵兰岛争端,俄加挪等国围绕罗蒙诺索夫海岭归属权之争。

北极5国除海洋划界争端外,还围绕200海里外大陆架归属问题展开了争夺。美国地质机构估计,北极油气资源主要蕴藏在离北极国家陆地300至500海里的北冰洋海底,这使北极5国对北冰洋大陆架的争夺空前激烈。

北极航道的利用和管辖问题在北极争端中占据了突出位置。由于北极航道具有潜在的经济和地缘战略价值,北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对这一航道的

的管辖和控制权。加拿大和俄罗斯主张北极航道是两国内水并出台了国内立法来明确它们对两大航道的管辖权。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就将东北航道建设成了一条连接其欧洲部分与远东的国内航线,称其为“北方海航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通过相关立法,强制外国船只接受破冰、领航服务,引起其他国家不满。因此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很少使用这条航线。

但随着全球气候逐渐变暖,俄罗斯正计划大力开发北极航道,希望让其变成重要国际海上通道。

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在1985年宣布西北航道属于其主权范围。目前,加拿大政府正加强对该航道管制,宣布将实施航行申请制度。

俄罗斯、加拿大对北极航线的控制引发欧美等国强烈不满。美国将两大航道定位于国际航道并宣称,过境通行制度适用于北极航道,美国保留在北极地区自由航行与飞行的权利。美国的主张得到了多数非北极国家支持。

北极各国剑拔弩张

北极5国为捍卫各自在北极利益,不仅纷纷制定北极战略,加强对北极资源的控制和开发,而且还不断强化在北极的军事存在,为将来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做准备。

俄罗斯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北极地区。尽管生活在北极地区的俄罗斯人只占全国人口1.5%,但该地区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2%,石油产量的20%,天然气产量的75%,全国出口量的25%。

俄罗斯媒体说,北极纷争的结果不是由国际法,而是由军事实力决定的。因此,为保护在北极的利益,俄罗斯正逐步强化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

针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毫不示弱。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开始强化其在北极的军事力量，不仅将其反导系统部署在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而且强化了其在北冰洋沿岸地区的海岸警卫队。美国军舰和核动力潜艇经常出没巴伦支海以及北极地区进行侦查活动。

作为濒临北冰洋的大国，加拿大在维护北极权益方面同样显示了强硬姿态。加拿大总理哈珀曾宣示：“北极主权问题上不存在争议，北极是我们的资产，是我们的海洋，北极属于加拿大”。加拿大制定了一整套计划来应对各国对北极的争夺。他们准备在北极开辟该国第一个深水码头，以便军舰和商船出入。加拿大政府准备拨款70亿美元在2012年前组建北极舰队，该舰队将拥有6至8艘具有破冰能力的军舰。加拿大还打算在北极建设军事基地，专门培训在极寒条件下作战的士兵。到2012年，士兵数量将达到5000人。

作为北极国家的丹麦认为，其它国家强化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将改变这里的地缘战略价值，丹麦军队面临着新的挑战。丹麦政府决定，2010至2014年间将组建北极联合指挥部，并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组建北极快速反应部队。2009年，丹麦、挪威和瑞典三国国防部长召开会议时提议，组建由三国海军空军组成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监视和威慑各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

在各国围绕北极争夺日益失控的情况下，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美国8国1996年成立了北极理事会这一国际组织，探讨各国在北极的行为准则。

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北极未来的开发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将对我国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北极地区丰富的资源对于能源匮乏的我国来说具有重大经济和战略价值，如果能分享到北极资源，对我国来说将是一笔巨额财富。

北极航道一旦开通，不仅影响我国海洋运输业和国际贸易，而且将带动我国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有可能使北部沿海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海运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国际贸易的货物运输，但

索马里海域海盗猖獗，马六甲海峡过于狭窄使我国很容易受制于人，这些因素都严重威胁我国海上运输和国际贸易安全。北极航线开通将使长期困扰我国的马六甲海峡困局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现在不采取行动，北极航道最终可能被少数国家控制，届时我国将再次面临马六甲海峡同样的困局，这条联系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新咽喉要道如控制在别人手中，我国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尽管北极离我们很遥远，尽管北极冰川完全融化还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尽管全面开发北极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但考虑到北极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巨大地缘战略价值，考虑到我国未来的安全和福祉，中国没有理由在日益激烈的北极争夺战中袖手旁观，充当看客。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及早采取行动，积极争取和捍卫中国在北极的正当权益，以免将来陷入被动局面。俄罗斯国防部战略技术分析中心军事专家安德烈·约宁说，“虽然20年甚至40年内仍然看不到回报，但是争夺已经开始。”

为此，在北极问题上，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出有关北极的国家战略，全面研究北极潜藏的经济价值和地缘战略价值，确定我国在北极的身份定位及利益范围，认真研究维护我国在北极正当权益的各种手段和途径。

第二，在承认环北极国家正当权益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如何以现有国际法为基础捍卫非北极国家在北极的正当和合法权益，确保北极资源不被少数国家操纵和控制。

第三，加强对北极的科学考察和相关研究，为中国主张在北极地区的权益提供法理和科学依据。正如西方媒体所言，在北极争夺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科技实力。没有强大的科研力量作支撑，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北极争夺战中取胜。当今时代毕竟与西方国家瓜分殖民地的时代不同，各国要想主张在北极的权益，必须提供合理合法的法理和科学根据。中国要想在北极争夺战中获得先机，就必须加大对北极的科学考察和相关研究。

（摘自2011年4月19日《经济参考报》）

新兴国家的社会难题

江时学

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它们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褒奖之声不绝于耳。但在社会发展领域，它们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而这也决定着它们能否实现持久稳定的发展。

问题凸显

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相比之下，以下几个问题尤为突出：

一是社会治安面临挑战，黑帮横行。在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犯罪率都在快速上升。凶杀、绑架、强奸和其他一些危害性极大的犯罪活动时常发生，小偷小摸之类的案件更是司空见惯。据报道，俄罗斯全国各地有数千个黑手党，其凶残程度不亚于臭名昭著的意大利黑手党。巴西和墨西哥的毒品卡特尔对执法人员和平民百姓大开杀戒，迫使政府不得不动用军队来维系社会治安。南非的偷盗如此严重，以至于2010年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球迷和记者也成了受害者。

二是“社会排斥”现象蔓延，冲突频发。“社会排斥”是指一部分人因经济收入少、社会地位低、出生于落后地区或其他一些因素（性别、宗教信仰、种族）而无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无法获得经济增长的成果，无法享受社会福利的社会分化现象。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弱势群体的成员常用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有些人甚至用暴力手段来引起政府的关注。

三是贫富悬殊拉大，市场混乱。贫困是万恶之源，但它更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贫困问题依然很严重。尤其在这些国家的落后地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不计其数。几乎在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非正规经济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非正规经济中，有些行业能提供一些就业机会，缓解了正规经济在创造

就业机会方面的压力。但也有一些行业（如毒品生产和走私、色情）则越来越成为一种毒化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

四是“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在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经济的腾飞构成一股巨大的“拉力”，诱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另一方面，农村发展的相对落后形成一股“推力”，将大量农村人口推向城市。而城市却难以吸纳如此多的人口。其结果是，城市边缘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贫民窟，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越来越得不到控制。

追根溯源

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

首先，分配存在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既可视作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也可被看作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其次，政府制定的各种社会政策收效甚微。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了涉及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就业、工资和税收等领域的社会政策。但在实施上述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它们常常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一是政府的财力不够，因此许多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虎头蛇尾”的现象。二是不能使各种社会政策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局面。三是经常受到利益集团的掣肘。处于社会“金字塔”顶部的公务员总是能从各种社会政策中获得最多的利益，而弱势群体，却获益较少。四是主管社会政策的政府部门的专业化水平不高，管理能力不强，从而使社会政策的成效得不到提高。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尤为普遍。五是迷信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机制能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力市场和税收等领域能替代政府的作用。上述难题最终导致用心良苦的社会政策收效甚微。

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动力呈多元化格局

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人的生活形态亦出现了新样式、新格局。

当代中国人生活形态变化的背后有着强大的生活动力，呈现相对稳定的多元化格局。调查发现，九个主要的生活动力依强度递减排序为：子女发展期望、个人利益追求、追求家庭幸福、追求人际优势、追求一生平安、尽力做好本分、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作贡献、追求生活情趣。

2010年，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地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其中，居民对政府机构、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等有政府背景的单位信任程度较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商业部门最低，属“基本不信任”范围。上海和广州两市的社会信任状况略高于北京。此外，蓝皮书指出，三地市民对广告、房地产行业信任缺失，对食品、药品行业出现信任危机。

由于社会信息流动加速，微博已成为2010年中国社会的重要关键词之一。蓝皮书认为，不断增加的用户使得微博逐渐向大众化普及，成为正在加速的公众风潮。年轻、高学历群体是微博的核心用

户群。微博用户的关注内容广泛，社会新闻、名人言论、生活常识、朋友动态均在关注范围内，“新、奇、趣”是这些内容的共同特点。经调查，七成以上的微博用户有意愿将微博作为获取新闻的重要平台，微博的媒体效应在进一步凸显。蓝皮书认为，无论是作为官方信息的发布平台还是草根秀场，微博带来的信息传播变革都对人们交流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外，奥运会前后的对比研究发现，民众的爱国情感、国际主义、公民效能感都有明显提升，市民的公共参与热情进一步得到提高。中国民众以慈善捐助、志愿者行动为代表的利他行为逐年增多。蓝皮书认为，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的矛盾，社会信任困境、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与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等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第一本年度报告。

（摘自2011年5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夏萌）

第三，教育事业得不到长足的发展。诚然，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口口声声表示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在现实中，受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于是，落后地区大量儿童被迫中途辍学。

第四，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减弱。在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般都伴随着政治体制的或多或少的改革以及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低收入阶层还是高收入阶层，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利益集团，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其结果是，政府试图强化社会控制能力的手段和愿望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积极迹象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社会问题的国家，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或严重性不同而已。因此，彻底消灭所有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对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听之任之。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已将加快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其工作重点，并为此而采取了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就业和增加社会福利等措施。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还调整了发展理念，将社会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这些无疑都是积极的迹象。

（摘自《环球》2011年第4期）

过度医疗几时休?

过度医疗的发生既是以药养医体制的恶果，其背后也牵连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置和医学伦理的丧失。抗菌药物滥用的状况已是异常严峻，由此而产生的耐药性使许多人在罹患疾病时无药可医，成为潜在的身体隐忧，尤其以抗生素的滥用为甚，钟南山院士就曾公开质疑无节制使用抗生素的必要性。抗生素滥用只是冰山一角，潜藏在深处的过度医疗行为则是看病过程中更大的危机，造成了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诸多社会问题。

卫生部医管司评价处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每研制一个抗生素要10年，而细菌产生耐药性只需两年。如果再不加以控制，过不了多长时间，老百姓看病吃药就没有有效的抗生素可用了！”

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被戏称为“三菜一汤”，去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就曾公开表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人均输液8瓶”的数字令人骇然。

过度用药只是过度医疗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利益驱动之下，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护理也无可避免。能够通过大处方、大手术、多检查获得高提成，已是公开的秘密。“医疗一般分为诊断、诊疗和管护几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表现都不一样，现在过度检查也比较突出，以前医生拿听诊器就能够诊断，现在听诊器都不用了，取代以先进的医疗设备，其实这些仪器的使用对人体都有害。”专门代理医疗纠纷诉讼的宋中清律师说。在手术进行之前，医生虽然会让患者进行医疗材料的选择，提供国产和进口的不同材料，但是通常不会告诉患者价钱的差别，而患者及其家属往往治病心切，选择了进口的之后，才发现非常昂贵。

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已经严重倾斜，医生的一支笔、一句话，决定了患者所要承担的生命代价

和看病成本。为什么相关法律法规的接连出台难以改变医治随意性的现状？对此，宋中清认为，“以前的医院管理、医疗质量、人员管理都有严格的规定，一些重大的手术、疑难手术都要通过院长签字，可以限制过度医疗，护士、护理人员如果发现医生的不当行为，也可以举报。但是随着片面市场化的进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使医生变成了一个赚钱的职业。”

据宋中清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就在防止过度医疗方面出台了大量法律以及相关制度，1982年4月，卫生部发布的《医院工作制度》，可以视为从根本上防范过度医疗等不良行为的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凡有重大手术、重要脏器切除、截肢、首次开展的新手术、新疗法、新技术和自制药品首次临床应用时，必须及时向院领导或有关部门请示报告。”“处方制度”则规定，“对违反规定、乱开处方、滥用药品的情况，药剂科有权拒绝调配，情节严重者应报告院长、业务副院长或主管部门检查处理。”

1984年制订、2001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规定，“禁止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账外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2004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处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一般应按照药品说明书中的常用剂量使用，特殊情况需超剂量使用时，应注明原因并再次签名。”此外，还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都以规范医疗行为为目标。

这样一张包罗了从医疗管理、药品管理到医务人员管理的法律法规网络却没有形成对患者的保护，诸多的制约对医院和医生来说，犹如虚设，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风险太低。

（摘自《南风窗》2011年第10期记者张墨宁）

让百姓敢花钱需过三道坎

罗宇凡 赵瑞希 邱明

“不愿花”

——鼓起来的“钱袋子”还在捂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922 亿元，同比增长 16.3%，增速较去年同期下滑 1.6 个百分点。

显然，楼市调控和城市治堵之下，“消费三大件”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导致消费列车遇到了动力问题。

“政策的影响还是外在的，更主要的是在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通胀形势下，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抑制，鼓起来的‘钱袋子’没有打开。”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说。

央行发布的 2011 年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14.2% 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创下了 1999 年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也表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就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但目前消费增长加速的空间十分有限，今年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往哪花”

——消费结构尚需升级

研究表明，消费结构升级主要是按照“衣食—住行—康乐”路径进行。目前我国消费结构正处于以“住行”为主的阶段。

专家认为，与“住行”相关的耐用消费品支出所占比重过大，显示出我国目前过度依赖于“住行”的消费结构不尽合理。

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韩世同说：“居民消费应当朝多元化的方向引导，满足基本的衣食后应当向住行和康乐方向升级。房、车要消费，但不能过度，否则将出现超前消费，从而必然会降低或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限制康乐相关产业的发展。”

然而，也必须承认，消费结构升级存在一定困难，其中包括诸多深层次的因素。李勇表示：“消费增长加速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从中长期制约因素来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王先庆认为，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现阶段调整消费结构，需要从降低流通成本和税费、制定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方面着手，把用于生存的基本消费品价格降下来。同时以公共财政支出扶持培育相关产业，助长用于发展和自我提升的第三产业消费。

“放心花”

——解决消费增长的后顾之忧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性转型，消费需求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长期以来消费不足导致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却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研究表明，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和消费环境安全性等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的主要因素。居民捂紧“钱袋子”、海外释放消费能力，反映出了深层次问题。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有待完善。韩世同认为，致使消费结构升级不稳定的一大困难就在于，医疗、教育、社保制度都并不是十分健全，人们对未来生老病死的后顾之忧始终无法消除，因此不敢提升消费档次和水平。提升消费能力需要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政策“保驾护航”。

——进口税费过高，同样的商品国外价格低很多。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品在国外的价格比国内便宜，所以很多人在网上代购，出国的人也都有一张购物清单。这表明今后应当大跨度地鼓励进口，以更低的价格换

分配不公的根源在哪

张蕴岭

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合理，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平。

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用于收入分配的部分比例降低。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快，经济总量这块蛋糕越做越大，用于社会收入分配的量也在增加，但是，用于收入分配的比例却在不断降低，2010年降到了35%，比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低十多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用于政府和企业的部分所占比例则不断提高。

这表明，我国公众的生活水平被压低了，没有跟上总体经济增长的步伐。此外，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太低（目前仅占10%左右）。社会保障开支是一种社会再分配手段，有助于普遍提升公众，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亦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实际收入差距的作用。

民富是国富的根基，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现在，政府强调要通过拉动内需来创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果国民的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内需增加就很难。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得不到完善，人们就不敢大胆地把收入过多的用于消费，而是把相当一部分钱存起来，用于未来保障。因此，大幅度提高居民分配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提高政府开支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让老百姓更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公众能够放心消费，不仅非做不可，也是当务之急。

分配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太大，而在收

入差距中，最主要的是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差距太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但是，收入公平确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应该实现的。事实上，按劳分配是承认收入差别的，老百姓并不要求收入人人均等。人们最有意见的还不是差别本身，而是由于不公平导致的非理性过度差别。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授权的垄断经营实体，由于拥有垄断专权，因此可以排斥其他经营者，获得独占利益和高垄断利润。按说，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资产，获得的利润也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但是实际上，高额利润首先被用于部门内分配，尤其是中高管的实际收入和福利。过去一些年，由于政策和管理缺失，近乎失控。

非法收入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非法收入多与权力有关，比如，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占用公共资源等。从揭露出来的案例看，大多数额大得惊人。还有灰色收入（福利），五花八门，也多与权势（部门）有关。

老百姓对这种社会不公平恨之入骨。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像一个毒瘤，非常危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让全体人民富裕，公平是关键。政府必须下决心有针对性地采取强有力措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更强大，国民更富裕，社会更公平。

（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4月（下））

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在海外释放的消费力重回国内。

——消费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三聚氰胺、瘦肉精、锦湖轮胎、染色馒头事件不断地将消费安全问题摆到人们眼前。由于把关者缺位，导致居民对于国内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

因此，为了吃得安全、用得安全，人们选择到海外购买同类产品。对此，韩世同认为，重塑消费者的信心对拉动消费非常重要，要让人们可以在国内放心花钱，就必须打造让人放心的消费环境，完善监管流程和惩治手段，摆正扭曲的价值观。

（摘自2011年4月19日《中国财经报》）

美公务员廉政的“严管”与“自律”

赵大舟

美国的联邦雇员队伍庞大，将邮递员计算在内有 265 万之众，但发生的贿赂案件却相对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美国法律的“严管”和联邦雇员的“自律”。

赠卡只限普通大众

人际交往难免“礼尚往来”，但如何选择合适的礼品却是一桩令人头疼的事。美国商家针对消费大众的这一难题，很早就推出礼品卡制度，赠送礼品卡在美国俨然成为一大时尚。

美国的礼品卡主要分两种：一种是银行或信用卡公司发行的有限额的银行卡，可以在任何场合消费使用，限额用完后随之作废；二是各类商家、超市、药店甚至书店推出的礼品卡，这类礼品卡金额从几十美元到上百美元不等，但只能在对应的商店内消费使用。

美国人通常不会赠送过于贵重的礼品，因而既能表达心意又方便消费的礼品卡备受人们青睐。在 2004 年年底的美国节日销售中，礼品卡名列销售额榜首。美国零售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民众 2005 年购买礼品卡的消费金额达到 184 亿美元，2006 年更跃升到将近 250 亿美元。

公务员受贿罪加一等

尽管社会上送礼成风，但美国的公务员队伍却较少受到侵蚀，因为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公务员受贿要“罪加一等”。

2009 年 7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腐败案。新泽西州的 3 名市长卷入其中，卡马拉诺市市长受贿 25000 美元，埃尔维尔市市长和苏亚雷斯市市长各受贿 10000 美元。

为了破获这起案件，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卧底 10 年，参与破案者由最初的十余人增加到后期的 300 人。根据估算，联邦政府破获此案耗费了 2000 多万美元，是涉案金额的 400 多倍。

美国打击腐败不计成本，为的是树立反腐败的警示效应。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沃德说：“美国公众要求公务员保持绝对的廉洁，因此任何腐败行为都会受到毫不留情的调查和惩罚。”

根据美国《联邦贿赂法》的相关规定，不论政

府官员受贿是属于“重型贿赂罪”或“轻型贿赂罪”，都可以处以相当于财物价值 3 倍的罚金，重者还可判处 15 年以下的监禁。受到此类“重典”的包括里根时代的白宫办公室副主任迪佛，他曾经利用权力之便，为政府官员和联邦议员牵线搭桥，从促成大笔生意中谋取私利，最终被判处 15 年监禁。

法律完备规范严格

1883 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为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确立了法律基础。在此后 100 多年的历程中，美国又相继通过各类法律，对公务员在道德操守和行为准则方面作出严格界定。

美国在 1978 年颁布《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该法于 1989 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1991 年又颁布《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这些法律成为公务员的行为指南。

《国务院雇员道德行为准则》中规定，公务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不能将政府资源挪作私用，包括使用政府车辆、公家电话和单位电脑等。

美国的公务员绝对禁止收受现金馈赠，可以接受的通常是 20 美元以下有纪念意义的小礼物。此外，公务员每年收受礼物的价值不能超过 50 美元。对收受的贵重礼物，或者上缴处理，或者退回给赠送者。因此，上文中所述五花八门的礼品卡，虽然可作为亲友之间的礼品，但却并不能送给公务人员。

公务员大多自律自爱

本人在美工作两年多，对美国公务员的“自律”颇有感受。如果一起吃饭，美国公务员会坚持 AA 制，而且算账既快且准，每人均摊多少零头都一清二楚。

公务员的“自律”很大程度上缘于法律法规的“苛刻”。《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第二章规定，“政府雇员不应利用其职位或从禁止送礼处索要或接受赠与的礼品”。所谓“礼品”，是指一切有价的物品。

美国法律也“基本禁止”公务员之间相互送礼，特别是向“上级”送礼。能够接受的礼物，必须“显然是来自亲属或好友”，能够接受的商业折扣券，必须是公务员都能享受到的优惠待遇。

公务员也会参与公务宴请活动，但政府各部门

丹麦人的幸福启示

比特纳

有人说，丹麦人幸福是因为他们对幸福的期望比较低，其实并非如此。总体来说，虽然他们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在财富积累或世界霸权方面野心勃勃，但他们在教育、医疗、人际交往、艺术修养方面的需求却高得多。“丹麦式的幸福”，用一种比喻来说明，并不是非要“登上顶峰”享受那种荣耀，而是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享受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惬意。这来源于一种能让人产生幸福感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能让人远离肤浅的愉悦感，通过一些持久的，甚至有点儿有悖常理的行动，为自己带来真正的幸福。

营造一个信任的环境

一项针对世界各国的调查显示，丹麦人是世界上最信任他人，也最值得被人信任的人群。在奥尔胡斯，你的自行车可以不上锁，你也可以把孩子放在婴儿车里摆在咖啡馆外面，根本无须担心。当然了，这种信任你得从两面来看它。丹麦人本身也会严格地遵守法律。在哥本哈根，行人过马路会耐心地等待绿灯，即使在凌晨两点马路上没有一辆车的时候，也会等。这种信任让丹麦的商业和贸易活动运转得更顺畅更高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丹麦为什么是世界上人均富裕程度最高的国家。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尽量生活在一个充满信任感的环境中，周围的人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当然，你自己也得做一

个值得信任的人。

宽容

不少国家的研究都表明，对其他种族及生活方式的宽容心态与幸福感有很大的关联。丹麦人是世界上率先给妇女投票权，允许同性恋婚姻，承认色情业合法的国家。

寻求社会地位的平等

在丹麦，谦逊是一种美德。在这儿，垃圾工可以和上层社会的人做邻居，而且相处融洽。商务人士坐计程车的时候会坐在前排，财政部长的助理会直接问她的老板——“克劳斯，来杯咖啡吗？”在其他国家，人们可能会觉得，想买得起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穿更时尚的衣服，就必须和周围的人竞争。但是在这儿就没有这种压力，在社会地位和物质方面你不用比周围的人强。事实上，如果你喜欢炫耀，反而会吃不开。

寻求经济上的均衡

丹麦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即便如此，丹麦政府每年还是会投入一半以上的财政预算去缩小社会上的不平等。这也许给其他国家一些启示。因为经济上的平等会产生一种安全感。但有一点要注意：丹麦人有一种新教徒式的工作理念，他们会非常努力地工作，甚至根本不需要经济上的刺激。

用于此项的经费很少，规定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包括在什么地方宴请、参加人数、每人的餐费标准是多少等，都要一一列清。对这类公务宴请，不能使用个人的信用卡结账，必须用政府信用卡结算。

反腐漏洞与法律尴尬

美国针对公务员的反腐败法律虽然能有效制止大量的“轻微受贿”行为，但仍无法阻止某些“蛀虫”在利益驱使下以身试法。

据媒体报道，负责采购的美国海军官员拉尔夫·马里亚诺日前被控利用职权之便受贿1000万美元。美国海军部长马布斯4月11日表示，海军已成

立特别调查组对该案及采购事项进行调查。

今年2月，美国律师控告马里亚诺及其家属和同事在几年之内，从一家科技公司总裁杜塔·古普塔那里收取了1000万美元回扣，而作为回报，马里亚诺向古普塔的公司下了价值135亿美元的订单。

更可怕的是“无形的”腐败，这就是政治献金问题。去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废除大企业提供政治献金的限额规定。政治献金从来都不是“公益善款”，背后必然有着利益交换，这是美国法律的尴尬所在。

（摘自2011年4月26日《法制日报》）

尊老爱幼

与其他国家相比，丹麦在老人和小孩身上花的钱，人均来讲是最多的。年轻人会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障。扎实的文科教育让丹麦人的工作能力很强，而老年人也能老有所依。成年人几乎不需要担心退休之后的生活，所以能专心去经营他们热爱的事业。退休之后，老年人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政府提供，所以能安度晚年。这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自由

在丹麦，孩子们从年幼时起，就被要求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孩子们会对老师直呼其名，而且对这种自由无比珍视。正是这种自由教会人们怎么来作出最佳的选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尝试一份工作，即使失败，社会这张“安全网”也会接住他们。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性取向，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几乎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丹麦人的两种品格之上——一个是社会责任感，一个是踏实的事业心。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在丹麦，由于人们的大部分薪水都要纳税，而且升职的野心会遭人鄙视，所以，为了薪水或者社会地位来选择工作没什么必要。人们只选那些感兴趣的工作，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满足感，也更容易跳槽的工作。丹麦人擅长的领域是家具设计、专业技术、艺术、建筑——这些都是流动性很高的职业，也是能创造出“心流”状态的职业。

恰到好处地工作

丹麦人每周平均工作 37.5 个小时，然后就回家去陪伴家人或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他们的年假高达 6 个星期。如果说人们是为了钱才工作，那休这么长的假就是为了平衡一下，别让自己全被工作占据。是他们对工作也有这样的理解：工作太努力或者工作太久都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他们会赶快做完工作，然后去做他们喜欢的事。

培养“艺术”人生

主动培养自己对艺术的鉴赏力可以受用终生。丹麦出了一位极有远见和智慧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尼古拉·格隆特维。他率先建立了民众学校，让农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文学、音乐和艺术等方面的教育。他们也在那里学到了交谈的艺术。如今，丹麦仍然有 90 所国家资助的民众学校，让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在那儿培养出对艺术的热爱。

营造一个温暖、明亮的居家环境

丹麦的冬季非常漫长，天黑得也很早。11 月份的时候，下午 4 点 45 分天就黑了。于是，丹麦人点起蜡烛，烧暖壁炉，呼朋唤友，营造出一种温暖的环境来抵挡漫长寒冷的冬夜。

加强人际互动

虽然丹麦人并不是特别外向，但他们却有加入社团的传统，而且是自愿加入——20 个人里就有 19 个加入了由政府资助的俱乐部。俱乐部的主题各式各样，有“兔子跳”俱乐部，有冬泳俱乐部，还有手球俱乐部。丹麦人认为隔绝感会让人不幸福，所以，这些俱乐部在丹麦人的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城市规划要有利于市民活动

如果身体不健康的话，那很难谈得上幸福。丹麦人一般身体都很健康，BMI 指数（即身体质量指数 = 体重(kg)/身高 m²(m)）很低，肥胖率也是欧洲国家里最低的。丹麦的城市设计很利于市民步行或骑车出行。10 分钟的步行，你可以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鹅卵石大街走到女王的城堡（现在也是一所公园），还可以走到海边（人们会在那儿游泳、驾驶帆船，甚至可以走到市郊的丛林中）。人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

做义工

有 30% 以上的丹麦人利用空闲时间做义工。这会形成一个更良好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让人们将关注焦点暂时转移到别人身上。像那位失业的焊管工人迈克尔·阿尔特曼一样，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依然通过做义工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将税收用之于民

没人会喜欢高达 68% 的税率，但调查却显示丹麦人能接受。毕竟，高税收的结果显而易见：每人都能享受良好的医疗保障；年轻人更愿意去接受教育，因为免费；所有居民都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在他们失业时提供保护，也让他们敢于跳槽去找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同时，政府也将高额税收用在能源领域，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发展到发展可再生能源上。从 1990 年到 2010 年，丹麦减少了 14% 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因此成为了欧盟中能源利用率最高的国家。现在，丹麦 30% 的电力都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如此高的税率似乎并没使丹麦的经济受损，在过去的 10 年中，丹麦的 GDP 反而增长了 40%。

（摘自《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韩亮译）

“意大利行业调研公司(SOSE)” 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和扶持经验

2011年3月应意大利高级财经学校的邀请,由中央党校图书馆副馆长郝莉为团长的“意大利体制”学习班,对意大利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与考察。通过聆听专家讲座与实地调研,团员们对意大利的社会状况、企业管理等方面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其中“意大利行业调研公司(SOSE)”对中小企业的管理和扶持的经验,让人耳目一新,值得我们借鉴。

意大利全国人口6000万,却有中小企业420万家,其中年收入在700万欧元以下的小公司占这一总数的90%。对如此众多的小企业进行管理是意大利政府的重要工作。因此,一家名为“意大利行业调研公司(SOSE)”的股份公司便应运而生。行业调研公司由意大利经济财政部创办,包括意大利中央银行在内的几家国营公司控股。目前,行业公司有工作人员120名,均有统计学、经济学方面的专长,有能力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进行分析,这些人往往是某些经济领域里的专家。创办这家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随时调查意大利中小企业的运营情况,杜绝中小企业的偷税漏税现象。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意大利企业的偷税漏税行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偷税漏税行为不像在美国、加拿大社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甚至会被整个社会痛恨;相反,在意大利,在一般民众心目中,能够成功地偷、漏税,被看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更不会有人向政府部门检举报案。这样,每年有大量的中小企业犯规逾矩自在话下。仅此一项,意大利财政每年的损失不可估量。行业调查公司对意大利206个行业内的中小公司以及国营大公司都进行调查评估。其内容涵盖:企业雇佣人员状况、企业收

益状况、企业的成本、企业的产品的销售状况(自己生产还是替人加工?客户哪些?)、企业的技术状况(哪些设备)等各个方面。根据调查,对企业的总体情况有个比较全面的掌握,由此进一步估计企业的盈利和征税数额。但是,每年对汪洋大海一般的小企业做一次彻底的、直接的地毯似的搜查是不现实的。因此,行业调查公司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向被调研的公司发放问卷,要求公司必须填写,并附在年度保税表后上交。对不同生产领域的公司有不同问卷设计,共有企业财会情况、企业结构方面的信息30000种。公司根据这些具体信息,通过经济指数,估算出每个企业的年收益大致情况,并提供给财政系统做为参考。由于有税务检查部门的配合,公司不能不如实填写,更不能拒绝填写。如此一来,比较有效地防止大量中小公司的偷税漏税。

行业调查公司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公司的管理,它在对中小公司的扶持方面也是有所作为的。由于在调查评估中掌握了公司的第一手资料,调研公司对每个企业的组织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调研公司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上升状况,潜力如何;哪些企业处于衰落状态,面临何种困境等。据此,调研公司可以让政府明了下一步投资的重点以及需要扶持的对象。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反观中国的企业情况,应该说与意大利颇为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些企业绝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政府对其进行税务管理和生产扶持同样需费周折。意大利行业调研公司的职能不失为一个绝好的范例。

(中央党校“意大利体制”学习班,张珊珍执笔)

中国：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

张维为

作为一个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强势文明，又在过去上百年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消化、转化、再创造，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标准，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话语是一定会影 响世界秩序演变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小国。小国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吃便饭，搭便车，大国不可能，大国需要全面发展。大国的发展和变化影响世界格局，因为大国变化产生规模效应、标准演变、范式变化。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套新的坐标。这些坐标并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看，这些坐标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进步甚至整个世界的进步，比如说办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比如说修建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比如说消除贫困、抗震救灾、进行城市改造、建立开发区、吸引外资、推进国企改革、推动新能源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标准。我们就这么做了，西方开始不理解，但最后还是受到了震动，甚至是很大的震动，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的文化基因太强了，你不想要中国特色，也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拒绝学习别人好的东西，而是要用中国特色来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潮流，它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并将改变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图。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来重新审视西方界定的所有其他观念和标准，如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GDP、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反诘的反诘，该扬弃的扬弃，该重新界定的重新界定，我们要把合理的东西吸收进

来，把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许多被中国经验证明的成功理念和标准推荐给世界。今日世界所有的难题都需要中国人的智慧才能解决好，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为人类进步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从更长远 的历史角度来看，待中国整体实力超越美国之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版图都可能随着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话语独霸天下的局面将寿终正寝，各种旧的指标体系将被修正，各种新的指标体系将应运而生，中国模式和话语将被全世界承认。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染指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世界可能正在目睹，并且将继续目睹中国崛起给西方、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不是中国自己想要这样影响世界，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力度必然会产生这种冲击波和影响力。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崛起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只要是改变你自己，世界就会因你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你的块头太大，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成为世界级的规模，产生世界级的影响。在一二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时，这种局面可能会达到高潮。

记得一位欧洲哲人曾经把世界上的作家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影响只是转瞬之间。第二类像行星，影响更为长久。第三类像恒星，其光辉和影响是最为久远的。其实，世界上的国家分类也大致如此。很多国家像是流星，它们一闪即逝。某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会把他们偶尔推向国际舞台，但不久就销声匿迹。美国则更像第二类。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有不少卫星围绕着这颗行星转，但行星只能管它那个系统，而美国所管的这个系统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具有现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缺少一种深远文明的智慧光芒。只因这颗行星离我

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王贻芳

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科学家、社会大众、领导人和管理部门并不一定有共识。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暂时的平衡,更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这是多年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科研投入的方向,其摇摆不定或含糊糊,会严重影响科研活动与产出。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你这个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回答没有,下一个问题就是:能得诺贝尔奖吗?如果回答还是否定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既没有实际用途,又不能得诺贝尔奖,这个基础研究有什么用?

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各级领导、平民百姓、知识分子、科研管理人员甚至一些科学家的心里,虽然有时候他们不一定说出来。

我们也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科学家不能只在象牙塔内自由探索,要与国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为什么什么作贡献。

这种要求自然有其合理成分,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显然有问题。这句话还隐含两层对基础研究的误解:其一,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自由探索;其二,

有实际用途的科研才是国家需求,基础科学不是。

什么是基础科学研究?其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不咬文嚼字,用我自己的话来讲,那就是发现与研究自然界的各种基本规律、收集相关知识、建立完整知识体系的(学术)活动。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更好地了解自然、理解自然,最终使人类能利用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科学研究本身就是最大的国家需求。

试想,一个大国,且不说有创造性的贡献,如果不能全盘掌握人类已知的所有知识及其体系,这个国家能有前途与未来吗?带过学生的都知道,要让学生掌握前沿知识、方法,必须让他做一项科研,题目本身有时并不重要,过程更重要。

基础研究有时也这样,有些研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科学家通过该过程走在本学科的前沿。说不定哪一天,国家就会大大需要。

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目标、方法、传统等等,外界不应怀疑与干预,要把选题的自由留给科学家自己,不能因选题似乎无稽而否定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

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全面发展,

们较近,其亮度看上去似乎比远处的恒星还亮,但这是假象。

“文明型国家”中国更像一颗恒星。它经历了无数岁月,一直守望着太空,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独立闪烁着自己的光芒。因为恒星太高、太远了,它的光辉需要很多年后才被世人所看到,但一旦人们意识到这是一颗恒星而不是行星时,人类对它的认识,对其他行星的认识,对整个世界和宇宙的认识,都会为之改变。恒星和行星是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质地不一样,组成不一样,运行轨道也不一样。恒星的光芒源于自己,也更为深远和明亮。

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1973

年他被问及:“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他接着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应该说汤因比道出了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对于整个世界的真正意涵。

(摘自《中国震撼》,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各学科的目标是达到本学科的国际最好水平。因此，基础研究既有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探索，也可以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规划的活动。以此衡量，学科建设与学术能力是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指标。显然，这方面我们有一些问题。

(1)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基础科学研究在口头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国内外的政治家都会在公开场合强力支持基础研究。但实际上很多人是叶公好龙。在实际投入的时候，走捷径的想法也很有市场：利用人家发现的规律、知识，我们只搞应用研究，不是比较省钱吗？但这样的“捷径”行吗？

张之洞、李鸿章等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只从国外引进了钢铁、枪炮、军舰等，没有引进科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解放后，我们大力提倡与实际结合，许多人都被要求去做“有用”的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原来大多都是做基础科学研究的。这样做的成绩有目共睹，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满足国家需求。

可惜的是，没有人研究其副作用：搞基础的人都去做了应用，以后怎么办？许多人感叹建国后重大创新成果缺乏，“钱学森之问”也成为舆论的热点。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轻视了基础科学研究，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培养与追求。吃完老本之后，现在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人才短缺的窘境。

解放后，科学事业的大发展一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但各种干扰也如影随形，从没有停止过。行政对教育的干扰，现在大家谈得很多；实际上，行政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干扰，后果也很严重。

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基础与应用的关系，研究其他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要用法律或法规的形式保证基础研究不再受干扰（有些国家把科学家的研究自由明确写入宪法），基础研究的投入应当得到保证，基础与应用研究的投入比例当然可以随经济的发展而调整，但应考虑到个人很难随时转换。做了应用研究，就不太可能回到基础研究上。

我绝不反对一部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转去从事应用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关键是不能因此削弱基础科学研究，而是要及时补充。

(2) 全面与重点的关系

从国家需求来说，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必须学科完整，全面均衡发展，缺一不可。不可因一时的兴旺而不顾一切地支持，也不可因一时的不时髦而不予支持，或任其自生自灭。重点只能是短期的，全面才是永久的。

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学科会暂时处于低谷。如果国家不考虑全面发展，不予支持或任其衰退、萎缩，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比如，最近关于放射化学及核燃料循环的讨论就突出体现了我国在放射化学学科建设上的问题。再比如，我国的核物理及相关的核技术、核工程的学科建设曾经严重衰退，许多原来有很好基础的大学，相关专业彻底消亡。

在核电大发展时代到来时，我们看到的是人才极度短缺，合格教师和学生培养能力缺失，相关科研能力凋零，拖了我国核电发展、国防需求及许多相关学科发展的后腿。

一些学科超常发展，实际上也打破了生态平衡，相对抑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有些学科比较容易发SCI文章，从各大学、研究机构与经费管理部门均能得到较好支持，其人才也较易“脱颖而出”。

虽然国内目前并无一个对各学科支持比例的完整统计，但从人员、文章统计及基金申请情况来看，失衡是严重的。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失衡并没有得到有意识的纠正，反而因各种原因不断加强。

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应该谋求整体水平的提高，在青藏高原上喜马拉雅山自然就会出来，而不是平地起高楼，只能一时一地，不能全面长久。对诺贝尔奖的渴望应该化为对基础科学研究长期、稳定、全面、均衡支持的不懈动力。

有关部门应该研究国际主流国家对各学科的支持比例，研究过去几十年来这种比例的变化，从而看清发展趋势。这种比例的确定当然很难在科学家内部达成共识，最终这是政治家或科研管理部门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应该是公开透明的。

（摘自2011年5月3日《科学时报》）

我国科技创新贡献率只及德美一半

张 维

在“2011知识产权南湖论坛”会上，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知识产权战略，成为今年的主题。与会人士透露的一系列数字，令人汗颜。

iPod 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售价为 300 美元，中国只从中获得 2 美元的组装费用。这是一个微观数字。

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 70% 以上，美国和德国甚至高达 80%，而中国现在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只有 40% 左右。这是一组宏观数字。

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瑞典在内的 20 个国家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中国也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目前的中国距这个目标究竟有多远？

单位增加值 美国是中国的 10 倍

去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位居全球之首，占全球制造业的 19.8%，领先于美国 500 亿美金。但由于劳动生产力不高及创新力不强，中国并不被认为是制造业强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介绍，中国的制造业，每一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加值为 1790 美金，而日本是中国的 6.5 倍，美国是中国的 10.2 倍。

至于创新力，差距更大。中国在去年专利申请量已经从 2005 年的全球第 10 位跃升为全球第 2 位。但是，我们作为世界制造工厂，处于国际制造业生产链的中低端甚至末端，如大型客机全部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设备、高端医疗设备依赖进口，集成电路设备 80% 依赖进口，轿车制造设备、数控机床 70% 依靠进口。

研发投入比 韩国是中国的 2 倍

创新型国家的综合实力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国家科技竞争力；二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国家品牌影响力。这三个方面的实力都集中表现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

去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总量达到 1.7%，略微超出世界 1.6% 的平均水平。而创新型国家的研

发投入已经占到 GDP 总量的 2%。韩国高达 3.1%，接近中国的 2 倍。

资料显示，中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平均只有 25%，距离发达国家 60% 以至于 80% 的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

再看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创新型国家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 70% 以上，美国 and 德国甚至高达 80%，而中国现在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只有 40% 左右。根据国家科技部科学技术发展中长期纲要的目标，中国到 2020 年才有可能实现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60%。

对 GDP 贡献率 日本版权业是中国的 3 倍

中国的版权贸易现状是进口大于出口。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统计，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美国为 43%、欧洲国家为 34%、亚洲国家和南太平洋国家占到其中的 19%，而其中日本占了 10%、韩国拥有 3.5%。可见，中国在亚洲乃至在全球文化市场里所占的份额是非常有限的。

有资料显示，世界版权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每天所创造的产值达到 220 亿美元，并且以 5% 的速度在不断增长。在创新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速度更快，英国达到 12%、美国高达 14%，而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的 30 年，GDP 增速平均为 9%，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则只有 5% 至 6%。

版权业对 GDP 的贡献率：美国达到 25%，日本达到 20%，欧洲达到 15%，中国目前是 6.7%。

世界知名品牌 中国没有一个进入 50 强

已是商标大国的中国还远远不是品牌强国。据美国品牌试验室去年的最新统计，国际知名品牌 500 强：美国拥有 237 个，法国拥有 47 个，日本 41 个，英国 40 个，德国 25 个，瑞士 21 个，而中国从 2009 年的 18 个降到 17 个，没有一个中国品牌进入前 50 强。进入 100 强的有四个商标，分别是中央电视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公司、国家电网。

根据联合国经发组织的统计，（下转第 54 页）

最该知道的 10 大科学定律及理论

10. 众理论的敲砖石：大爆炸理论

标准释义：大爆炸是描述宇宙诞生初始条件及其后续演化的宇宙学模型，其得到了当今科学研究和观测最广泛且最精确的支持。目前一般所指的大爆炸观点为：宇宙是在过去有限的时间之前，由一个密度极大且温度极高的太初状态演变而来的（根据 2010 年所得到的最佳观测结果，这些初始状态大约存在于 133 亿年至 139 亿年前），并经过不断的膨胀到达今天的状态。

9. 推算出宇宙年龄：哈勃定律

标准释义：来自遥远星系光线的红移与它们的距离成正比。该定律由哈勃和米尔顿·修默生在将近十年的观测之后，于 1929 年首先公式化， $V_f = Hc \times D$ （远离速率 = 哈勃常数 × 相对地球的距离），其在今天经常被援引作为支持大爆炸的一个重要证据，并成为宇宙膨胀理论的基础。

8. 改变整个天文学：开普勒三定律

标准释义：即行星运动定律，由开普勒发现的行星移动所遵守的三条简单定律。第一定律：每一个行星都沿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中；第二定律：在相等时间内，太阳和运动着的行星的连线所扫过的面积都是相等的；第三定律：各个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和它们的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7. 大部分理论的基石：万有引力定律

标准释义：牛顿的普适万有引力定律表示为，任意两个质点通过连心线方向上的力相互吸引。该引力的大小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两物体的化学本质或物理状态以及中介物质无关。该理论能够由一个已经写进今天高中物理课本的公式进行表述： $F = G \times [(m_1 m_2) / r^2]$

6. 物理科学有了基本定理：牛顿运动定律

标准释义：牛顿第一定律为惯性定律；牛顿第

二定律建立起物体质量与加速度之间的联系；牛顿第三定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5. 热力学基础基本完备：热力学三定律

标准释义：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可以转变为功，功也可以转变为热，也就是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第二定律有几种表述方式，其中之一是不可能把热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他变化；第三定律，在热力学温度零度（即 $T=0$ 开）时，一切完美晶体的熵值等于零。

4. 公元前 200 年的大智慧：阿基米德定律

标准释义：物理学中的阿基米德定律，即阿基米德浮力原理，是指浸在静止流体中的物体受到流体作用的合力大小等于物体排开的流体的重力，这个合力称为浮力。数学表达式为： $F_{\text{浮}} = G_{\text{排}}$

3. 我们自身的探讨：进化与自然选择

标准释义：进化，即演化，在生物学中是指种群里的遗传性状在世代之间的变化。自然选择也称为天择，指生物的遗传特征在生存竞争中，具有了某优势或某劣势，进而在生存能力上产生差异，并导致繁殖能力的差异，使得这些特征被保存或是淘汰。

2. 永远转变了理解宇宙的方式：广义相对论

标准释义：引力在此被描述为时空的一种几何属性（曲率），而这种时空曲率与处于时空中的物质与辐射的能量—动量张量直接相联系，其联系方式即是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一个二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

1. 上帝掷骰子吗：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标准释义：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 1927 年提出，表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指在一个量子力学系统中，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粒子的质量乘以速度）不可被同时确定。

（摘自 2011 年 5 月 2 日《科技日报》
记者张梦然综合外电整理）

台海谍战

钱亚平

重创台湾间谍网

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往往也是台湾间谍的活跃时期。有趣的是，大陆对台湾间谍网络的重创恰恰源自台湾地区领导人自己的“泄密”。

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大陆对台军演，据新华网报道，李登辉为了“安慰”岛内居民，炫耀说“大陆所发的导弹不是实弹，而是空包弹”。

这一“空包弹”的言论，引起了我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由此顺藤摸瓜地揪出潜伏多年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宗和少将刘连昆。

刘连昆案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策反刘连昆是台湾“军情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专案”，该方案曾被曾任台湾“军情局”局长的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通过一位“台商”间谍张志鹏，台“军情局”将邵正宗策反，随后又将刘连昆拉入该组织，向台湾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该间谍案中侥幸漏网的台湾间谍张志鹏逃回台湾后，声泪俱下地斥责李登辉一句话害得间谍组织“全军覆没”，并表示要控告李登辉。但这次状告李登辉最终不了了之。张志鹏向台湾安全部门提出一亿新台币的赔偿要求，也遭拒绝。

同样的乌龙事件在2003年再度上演，使得台湾在大陆的间谍系统损失殆尽。

陈水扁为求胜选连任，推动导弹“公投”，在高雄“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得意地指出，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部署了49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且部署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

陈水扁如此“精确”的情报立即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警觉。他们很快锁定了一批行动诡秘、出入异常的“台商”。半月之后，安全部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36名涉案间谍，将“军情局”上校李运溥建立的间谍网连根拔起，另一名解放军少将刘广智也因涉案其中被捕。刘连昆、刘广智“二刘”台谍案，也被视为建国以来军队最严重的间谍案。

“被死亡”的谍报人员

据《环球时报》报道，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

守台湾至今，从早年的“神斧行动”、“班超行动”、“光武行动”、“三民行动”、“海狼行动”、“长风行动”，到近年的“威远行动”和“定远行动”等秘密情报行动中，总计有3000多名台湾特务“以身殉职”。

但如果把大陆涉案人员及被捕关押的间谍计算在内，人数不止这些。“究竟有多少人，两岸均未公布数字”。

由于情报人员大都是单线联系，一旦失事，很难进行统计。丁渝洲在其回忆录中透露，半个多世纪以来，因失手被捕、死亡、失踪的台湾谍报人员，多达1.9万余人。

这些间谍往往没有“名分”，这也意味着，如果他们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曝光，他们并不能获得台湾当局的保护。即使有些人侥幸存活并历经艰险返台，也往往受到打击。

早在1975年，一大批台湾特务被大陆特赦释放，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却被台湾当局拒之门外。回到台湾的姜建国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他的身份，却没有给他任何补偿。

上海纪实频道纪录片《特务》中有一段间谍岳正武的故事。1992年回到台湾的间谍岳正武，也有着相似的经历。1960年他和其他4人由“中美联合情报中心”派遣空投到青藏高原，进行情报搜集。然而他既没有得到台湾的俸禄，回到台湾后，也没有得到补偿。

一些台湾间谍，甚至面临着“被死亡”的困境。

一些失事被擒的台湾间谍，很快就被台湾当局宣告“死亡”。即使有一天，这些“起死回生”的人重新在社会出现，他们也不会被台湾军情部门接纳和承认。

同样被“牺牲”的还有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无期的台湾间谍李俊敏，当其在大陆被释放，“死而复生”准备返台时，却遭到当局种种刁难。

一些遭遇不公的间谍们愤而选择了抗争。3月12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北地院判决国民党赔偿17名台湾特工280多万美元。20多年前，这些特工被派到大陆搜集情报时，国民党曾有“失事”补偿

承诺，结果被捕、出狱后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他们写信给国民党领导人，也一直没下文。他们便将国民党告上法庭。

台海谍战之变

即使是两岸关系缓和改善的当代，两岸谍战仍在上演，其手段也不再囿于传统方式，计算机网络成为新的必争之地。“网军”尤其是“黑客”成为台湾情报部门的另一股力量。

2008年上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监测发现，大陆地区外的木马控制端IP有98230个，其中来自中国台湾的占到65%，高居榜首。

“网络特务”渐渐成为国安部门监控的重点之一。2008年，国安部门罕见地通过媒体发声，指名道姓地对台湾“军情局”的一名网络间谍李芳荣提出警告，并称“只要缉拿归案，一定严惩不贷”。此事在媒体透露后得到国台办例行记者证实。

30岁不到的李芳荣是台湾“军情局”派驻俄罗斯莫斯科的职业间谍。在俄期间，他利用黑客技术，控制了大陆多个服务器，并通过木马程序大肆实施网络窃密活动。

据《环球时报》报道，台湾谍报机关还制订了一系列网络专项计划，在全球设立了数十个网络情报工作据点，以大陆周边国家为主阵地，采用狼群战术进行网上窃密和情报渗透。

此外，台湾间谍会潜伏在一些军事网站和军事论坛上寻找可能提供情报的人员，以期“将他们发展成间谍”。如他们常以某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招驻华代表的名义，向这些人约稿，或让他们提供一些

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部资料、原始资料，并许以丰厚薪金等。

2003年，军事发烧友马培明就是这样“被拉下水”的。他最初只是喜欢在军事论坛上发表评论，后来一名“军情局”间谍以向他约稿为名逐步将其吸收为间谍。

近几年，两岸交流持续增温。台湾情报部门高层直言，“现在两岸情势这样，大家都不愿意碰这个”。据透露，甚至连台“国安局长”蔡得胜都曾在内部坦言，如有需要未来也“不排斥”到大陆访问。

据《环球时报》报道，2009年，台湾安全系统传出消息称，目前两岸关系缓和，台“国安”高层因此要求负责统合联系各情治机构的“国安局”调整工作，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情报人员布建工作。随后台高层机构出面否认了这一消息。但无论是“国安”情报系统或军方内部，都似乎更强调做好内部保密。

对大陆的网络黑客入侵，比之前有了降低，2010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的境外木马控制端IP，台湾占到4.8%。

2010年年底，台湾“军情局”退休人员一行19人，在前“国安局”中将徐炳强、前“军情局”少将黄其梅带领下，组团前往大陆浙江省江山市戴笠故乡参访。这是两岸开放以来台湾情报界正式访问大陆的首例。

台湾某媒体消息说，一些台湾情报官员说，虽然两岸关系有了缓和，布建仍是取得情报的“非常重要手段”，目前并未收到停止敌后布建的指令。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8期)

(上接第51页)国际知名商品已经高达8.5万种，其中90%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创新型国家所拥有。吴汉东说：“品牌预示着企业的市场份额，展示着国家的外在形象。”无怪乎日本前首相在访问欧洲时不无自豪地说：“我的左脸是索尼，我的右脸是松下。”

汗颜之外 一组“还好”的数字

据出席会议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司长黄庆介绍，全国已经有16个部委，制定了本领域的知识产权实施意见或者是具体方案。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93个地市正式颁布了

本地的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或者意见。

黄庆透露，2010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了39.1万件，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3.5万件。同时，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的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到了12377件，排名世界第四，比2009年增长了56.2%。

黄庆表示：“在发明专家、数量、质量逐年提高的同时，中国企业的自身竞争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出现了像华为这样有代表性的企业，这再次印证知识产权助推经济的作用正在日益凸现。”

(摘自2011年4月26日《法制日报》)

把心脏的潜力挖出来

贾海忠

人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心脏功能也在随时发生变化。怎么才能把心脏的潜力挖出来呢？

首先来看看心率。心率就是心跳的快慢。天气热的时候，人的代谢快了，心率就增快。运动的时候，要是不提高心率，供应的血液就不够全身使用，所以必须把心率提上来。而人休息的时候，心率就会慢下来。有人发现自己刚起床心率为50多次，一吃饭是70多次，一走路就到了100多次。心率变化这么大，心脏是不是有病？其实不然。在不同状况下心率变化大，正好说明心脏的潜力非常大，需要快就能快起来，不需要就能慢下来，这是心脏功能好的表现。在临床上，医生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总想让心率保持在每分钟70—80次，其实这是不对的。

再来看看心肌的耐缺氧能力。如果在氧气充足的环境中工作，就不用提高心脏的耐缺氧潜力。但是，如果需要在缺氧环境中短时间经历一下，心肌的耐缺氧能力不行，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突然死亡。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有什么好处？比如说像在地震中被埋但又不足以致死的情况，空间很狭小，氧气不够用。如果心脏的耐缺氧能力很好，生存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可以争取到被营救的时间。

有一个办法，既可以锻炼心率，也可以锻炼心肌耐缺氧能力，还可以锻炼心肌收缩力，那就是“有氧运动”，它是提高心脏潜力的最好办法。

一个人适合做哪些运动，是有讲究的。散步、跑步、登山、游泳、劳动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这些运动能够增加机体的耗氧量，给心脏增加一

定的负荷，使心脏处于一种“又饿又累”的状态。“饿”是指心脏本身血液相对不够用，所以运动多了会感觉气短、憋气。再严重时，就是憋气、跑不动了，是心脏“累”了。通过“饿”和“累”，正好锻炼心脏的潜力。

那么，是不是心脏越“饿”越好、越“累”越好呢？当然不是，锻炼是需要把握尺度的。

一些人认为，要使心率提高百分之多少，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如果心脏潜力没有那么大，你非要做到那个程度，对于心脏来讲是严重超负荷了，根本就达不到锻炼目的，反而伤害了心脏。如果你心脏的潜力比较大，达到那个数值对你来讲轻而易举，这样就又达不到提高心脏潜力的目的。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不能靠一两次的锻炼来提高心脏潜力。具体的方法是，当运动到稍微有点累了即可。之后，在这个程度上坚持一段时间，直到感觉不累为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一点，又觉得稍微累了，再坚持一定时期。不需要每天都提高，这样你的心脏受不了，也达不到锻炼的目的。一定要一点一点地增加，每增加一点，持续一到两周，这样就可以把心脏的潜力稳妥地提高了。

心脏的潜力到底要提高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定要跟刘翔一样呢？刘翔是田径运动员，他的心脏功能很好，但不是说每个人心脏的潜力都要达到那种程度。其实，够日常的使用和消耗就足够了，适合自己就是最好。

（作者系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摘自2011年5月5日〈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根据201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显示:2010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再次实现新的飞跃。

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8783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的54589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的比重由2009年的8.6%提高到2010年的9.3%,上升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由2009年的35.3%提高到2010年的40.1%,上升了4.8个百分点,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0年GDP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加拿大和印度。其他金砖国家俄罗斯位居第11位,南非位居第28位。

另外,据IMF统计,我国人均GDP在2001年达到1000美元、2006年达到2000美元、2008年达到3000美元、2010年突破4000美元,我国用了10年的时间实现了从1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飞跃。我国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居世界第93位,比上年前进了4位。

2010年人均GDP居世界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挪威、卡塔尔、瑞士、阿联酋、丹麦、澳大利亚、瑞典、美国和荷兰。我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摘自2011年5月5日《中国信息报》任小燕)

世行报告显示:我国 高速公路通行费全球最高

公开资料显示,全球共有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占了七成。2007年2月,世界银行专门发布的一份有关我国高速公路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高速公路通行费全球最高,而通行费的可承受性全球最低。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收费公路,中国人承受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公路运输费用,这些钱到底都用在哪儿?

2008年审计署的二号公告也许能给我们一点提示,当时对全国18个省市19万公里中的8.68万公里收费公路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有58亿元遭闲置或被挪用,根本没有用于公路再建设或偿还贷款,17.9亿元被挪用于建楼堂馆所、投资股票和对外投资,用来还贷的钱不及收到的过路费的1/10,远远低于有关办法规定的70%的比例。此外,大量依托收费公路产生的服务设施收入、广告收入等不纳入统一核算,转至账外,或是成立内部职工参控股的经济实体经营管理。仅2003至2005年,就有6.1亿元被转到账外或经济实体,其中0.83亿元用于发放奖金、福利等。

审计同时发现,有些公路收益已超过投资的10倍以上。根据交通部资料,自1984年国家允许公路项目融资到2000年,期间公路项目融资超过6700亿,按照10倍收益计算,仅公路收费一项就能切掉社会6至7万亿的财富。

(摘自2011年5月5日《经济参考报》记者陈圣莉)

我国制假经济规模 逾千亿元

由中国管理科学院、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等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诚信企业家大会”在北京举行。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副司长温再兴在致辞中说,当前我国的诚信环境较差,特别是商业信用缺失严重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突出问题。

温再兴表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逾期的账款规模较大,坏账率较高。

其次,合同履约率低,在目前我国每年签订的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约50%左右。

再次,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假的现象较为普遍,有调查显示我国制假经济的规模高达1200多亿元,造成国家每年损失税收超过250亿元,全国283家名优企业中有35%的企业产品被假冒侵权,650多种产品被仿造。

最后,交易损失严重,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多起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缺失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

(摘自2011年5月3日《科学时报》潘铎 汪中亮)

论点摘编

1. 中国崛起需要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鲍盛刚在《红旗文稿》2011年第9期撰文指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基础上的和平崛起,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是有利的。当然,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矛盾和不足,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需要从过度依赖外资和出口的外生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生增长模式为主。首先,要将发展驱动力由外资逐渐转为内资。第二,要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内需。第三,在全球产业链中,加速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第四,经济发展应考虑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延伸,以中西部的发展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形成自己的内循环系统,摆脱对外部循环系统的依赖,由此使中国经济呈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的发展。

2. 优化配置研发(R&D)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卢方元、靳丹丹在《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3期发表论文,论述了我国研发(R&D)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他们认为:第一,我国各省市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在制定有关经济与科技发展政策时,必须保持合理的R&D投入结构,优化配置R&D资源,有效利用科技基础资源和科技人力资源。第二,总体上,我国各省份R&D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高于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因此,各地区在加大R&D经费投入力度的同时,更应该注重R&D人员数量与质量的同步提升。第三,R&D投入的短期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有正的影响,但大部分地区GDP的增加幅度小于R&D人员的增加幅度,更小于R&D经费投入的增加幅度,绩效不高。第四,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3. 多管齐下,重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廖西元、李凤博等在2011年第4期《农业经济问题》上撰文指出,我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农民之困惑、

地方政府之心病、中央政府之无奈”的突出问题,关键在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缺失。为此,必须实现“生产粮食”向“经营粮食”的观念转变,采取精心设计利益协调和特殊保障两个制度、提高产区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两个积极性、把握粮食收购加工和投入品经营两个主动权、用活粮食进出口和加工转化两个调节器等措施,以综合生产力为基石、市场调节力为重点、主权控制力为保障,重构我国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

4. 抓住特点,健全政策,解决农民工问题

李建华、郭青在《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3期撰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并据此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他们认为,新生代农具有五大特点,一是渴望融入城市社会,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二是文化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三是思想活跃,公平意识、公民意识和维权意识强;四是勤俭意识淡化,消费意识较为现代;五是更加注重交往,重视知识学习和子女教育。为此,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其中;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战略性转移;建设县城和小城镇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文明家园;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5. 采取措施,发挥网络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正面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于《红旗文稿》2011年第8期撰文分析了网络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影响。他们认为,网络传播在群体性事件中是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又容易产生负面效应。所以,要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建设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克服不利因素,发挥网络媒体在预防、化解群体性事件中的正面作用,使新兴媒体为构建和谐服务。一是弘扬主旋律,加强马克思主义网上阵地建设;二是综合管理,从法律、道德、技术等方面采取可行办法;三是提高网络媒体的敏锐性。

(编辑部阎荣舟整理)

我们拥有太阳

——献给党的九十周年

严阵

你值得拥有
你值得拥有什么
而我们
我们却
拥有
太阳

在那些长夜漫漫的
岁月
太阳便在我们的
梦中
升起
它照亮了我们
前进的
道路
它照红了我们
艰难的
呼吸

于是母亲不再在
灯前
流泪
于是村庄不再在
雪下
叹息
于是我们的民族
不再
呻吟
于是我们的国家
不再
哭泣

你值得拥有
你值得拥有什么
而我们
我们却
拥有
太阳

在那些风雨如磐的
年代
太阳便在我们的
心中
发光
它鼓舞了我们
坚强的
斗志
它点燃了我们
未来的
希望

于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改变了
命运的
航向
于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
建筑起
胜利的
曙光
于是我们用号角
吹响了一支又一支
历史的
进行曲
于是我们用草鞋
踏平了一座又一座
封建的
殿堂

你值得拥有
你值得拥有什么
而我们
我们却
拥有
太阳

如今

太阳照亮了我们的
每一扇
门窗
如今
太阳照亮了我们的
每一幢
住房
如今
太阳照亮了我们的
每一座
山冈
如今
太阳照亮了我们的
每一片
海洋

今天
我们的生活
很阳光
今天
我们的事业
很阳光
今天
我们的心上
很阳光
今天
我们的梦里
很阳光

你值得拥有
你值得拥有什么
而我们
我们却
拥有
太阳

作为一棵小草
我们所以能够生长

那是因为
因为我们拥有太阳
作为一朵小花
我们所以能够开放
那是因为
因为我们拥有太阳
作为一把泥土
我们所以能够闪光
那是因为
因为我们拥有太阳
作为一粒沙子
我们所以能够辉煌
那是因为
因为我们拥有太阳

当今世上
谁能比我们
更美丽呢
我们全身上下
全是一片
五彩的
光芒
当今天下
谁能比我们
更富有呢
我们前后左右
全是一团
炫目的
辉煌

你值得拥有
你值得拥有什么
而我们
我们却
拥有
太阳